

陳伯達等著

閻錫山批判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

陳伯達等著

閻錫山批判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翻印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目次

編者的話

閻錫山批判

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五千言書

駁斥閻錫山荒謬宣傳

晉西事變真相

陳伯達

續鐘亭

薄一波

韓鈞

附錄

(一) 閻錫山部六十一軍進攻決死隊八路軍

(二) 閻錫山所部官佐二八〇名通電全國反對內戰

(三) 閻部將校二百餘人通電全國呼籲和平

(四) 請看閻錫山部下的日記記着閻逆多少罪惡

閻錫山批判

(一九四四年八月)

最近西安各報公佈了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的談話，其內容除了對於抗戰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和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極盡造謠譏諷之外，沒有其他的東西。對於閻錫山這個人，我們是熟悉的，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高唱反共，向華北伸出其侵略魔手的時候，閻氏就是首先成爲反共應聲蟲的一個，那時候，他那一套一套的反共「理論」都捧出來了。一九三一年，他在日本帝國主義租界地的大連爲反共而寫的所謂「物產証券與按勞分配」也發表了。爲了達到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目的，閻氏對於當時揭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大旗的中國共產黨，不惜採取一切最無聊的造謠中傷手段，這裡我們不想多費筆墨去敘述它。抗戰開始後，雖則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山西多方面幫助了他，希望他能够在敵人進攻的面前站得住脚，但是閻氏始終念念不忘於反共，把反共放在抗戰的前面，繼續他在抗戰前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的造謠攻擊。不過這一



時期，他的反共是隱蔽的，不公開登在報紙上。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七月（有一個單行本又說是九月），他在晉綏軍高級將領會議上發表一個『建立中心思想』的講話，全篇沒有向日本帝國主義射出一箭，一切的箭都集中向共產主義射來，對於他過去的造謠又重複一遍，並作了一番小小的概括，說什麼共產黨『欲貫徹共產主義的主張，須繼續不斷天的殺人』，『更不能不提倡仇父，鼓勵女子裸體遊行』（見閻氏『救國言論選集』第二輯）。這些，可以說是造謠造到無聊之極了。可是，閻氏却還在那裡滔滔不休地喧嚷着，希望取得那些與民為敵的人的信任。共產黨因為還想團結他一道抗戰，對於他的各種無理取鬧，向來採取容忍的態度，即使有同志對他發過一點批評，態度也是溫和的。關於他勾結敵人的事實，一直希望他改悔，長期地沒有把它公佈。可是閻氏不但沒有中止對敵人的勾結，而且沒有認為共產黨人對待他所採取的容忍或緘默是一種好意，反認為可欺。在他那裡繼續進行一切反共的思想宣傳，最近對中外記者的談話，竟然是那末信口誣蔑了。對於閻錫山這種肆無忌憚的造謠毀謗，最好的回答，當然是揭露各種的事實，而解放日報八月十一日所登載的太行電訊，八月十四日所登載的薄

一波同志、韓鈞同志的談話，八月十六日及二十四日所登載的續範亭先生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回答。這些消息、談話和文章都暴露了閻錫山勾結敵人、反對人民的鐵的事實。我這篇東西，只是想就閻錫山的思想及其實踐的若干問題加以檢討。有的問題，以前有同志說過的，這裡就不再說，或者少說，有的問題，如係比較次要的，這裡也不準備去說它。

一 閻錫山的出發點

抗戰以前和抗戰以來，閻氏各種花樣翻新的『學說』，和他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措施（即所謂『新政策』），是有他的一貫出發點的。他這個出發點既不是為人民，也不是為抗日，而是為維持他獨自在山西所已壟斷了數十年之久的寡頭專制政權。這回中外記者團到克難坡（即閻氏政權機關所在地）的時候，那裡一個『負政治責任的人』曾經這樣告訴過其中一個記者：他們近來在山西所實行的那末一套，『主要的原因，却是環境所影響，非如此就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政權』。『要完成戰爭』，他坦白地說，『據我們

的經驗，爭取戰區民衆，還是比較輕鬆的工作……我們所最感困難的，是社會廣義的宣傳。爲了維持正常的行政系統，我們不能不請求應付之道。」「我們認爲，對共產主義的活動，最好的應付方法，……是健全自己的民衆組織，改善民衆生活的弱點。」（見重慶『新民報』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由此可見，閻氏的政府，只是簡單的爲維持他的寡頭專制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而在閻氏看來，維持他的這種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乃是同義的東西，乃是同一的工作。至於抗戰呢？卽就早放在他的腦後了。

這類的思想，從閻氏的講演和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有一個講話，在那裡，他認爲：只要『拿政權者』（按：實際上是一堆沒有經過任何人民合法手續產生出來的政權篡竊者）善於『適生』，政權就可以『永不會崩潰』。（見閻錫山『言論選集』第二輯二四八頁）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二月，他又有一個講話，公開說出：自從九一八以後，他『經過數年的同中樞要人在南京、太原迭次磋商』其中大問題，卽爲『如何鞏固政治，則成爲抗戰的緊要問題』。（同上書二七八頁）閻氏這裡的意思是明白的，作爲中國抗戰之緊要問題的，並不是如

何加強抗戰的力量，以取得勝利；却是如何鞏固他們原來所壟斷了的專制政治，以避免人民的染指。根據閻氏這段話，回溯一下歷史，也是有趣味的。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閻氏有『復蔣介石先生函』，同年十二月九日，閻氏又有『對全省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講話』。那時日寇窺謀華北，提出『華北五省防共自治』，形勢極端緊迫。大家知道，十二月九日又正是北平英雄的學生們舉行悲壯的示威運動，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日子。可是，閻氏在那裡提的問題，却絕不是如何抗日救國，而是如何『防共圖存』。他說：『能自存與自固，聯日好，聯俄亦好。不能自存與自固，聯日無益，聯俄亦無益。』他又重複地說：『靠國聯無益，靠英美亦無益，親日無益，親俄亦無益。若能自強，國聯可靠，英美亦可靠，親俄有益，親日亦未嘗無益。』（以上所引，均見閻氏『言論輯要』，線裝書，第九冊）事實上，那時閻氏連做夢也還沒有夢到抗戰這一件事，那時他討論的僅僅是——像一批可憐蟲的無恥的反動派一樣——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祈禱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賭博上，並計劃如何使自己得在他所祈禱的這一個『日俄戰爭』中專心從事『防共』的工作（見同上的兩個文件）。那時閻氏

所謂『如何鞏固政治』，真相就是這樣。既然他連做夢都還沒有夢到抗賊這一件事，所以也就沒有和什麼抗戰問題聯系過。他的所謂『自存與自固』，所謂『自強』，絕不是有什麼民族意義的成份在內，而是『防共圖存』，『鞏固現有的政權』，也即是鞏固閻氏及其同類者的寡頭專制政權。只要他或他們這個政權可以『適生』，『永不崩潰』，據他的意見，就使是聯日，也不算壞，却是算『好』的。你看，閻錫山就是要這樣來處置我們的民族危機問題。

至於在閻錫山所壟斷的這個寡頭專制政權下面的情況究竟是什麼情況呢？他統治了二三十年的山西，不錯，那也是個『模範省』。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模範』呢？不用我們多說，請看閻錫山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他的綏靖公署省政府紀念週上所自己供述的吧：『山西自身，爲國民經濟崩潰之自身』。『山西國民經濟，曾成破產之勢。十家九貧，十村九困』。（『言論輯要』八冊）這就是閻氏在山西的政績。從他這個政績，可以看到他這個政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這就是極端腐朽的反人民反民族的殘民以逞的寡頭專制政權。可是，閻氏無論如何，是必須維持他這個政權的，爲此，他可以支出一切代價，採取一切手段。爲此，他要加強反對人民，加強反對民主主義。而他

所以把反共的工作放在最前面，就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最澈底地代表人民利益和中國民主主義，因此又是最堅決地代表抗日路線的政黨。爲了保持他的政權，他在人民的抗日高潮中，竟然提出『親日亦未嘗無益』，而毫不覺得羞恥。真的，這樣的話，如果不是這樣的統治者，如何能說得出口呢？

一九三五年，閻錫山和日寇的『華北防共自治』唱雙簧，提出了『防共的兩個根本大法』。他說：

『……我認爲這兩條路，均可以澈底的防共，走前一條路，可以說是用法西斯主義的防共方法；走後一條路，可以說是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爲防共方法。法西斯蒂的防共方法，是要富人增加負擔，與政府合作鞏固現有的政權，抵抗共黨勢力（按：即指抵抗人民民主勢力）的侵入。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爲防共方法，是廢除土地私有權，樹立土地公有制，消滅共黨發生的基礎。然而不能走前一條路，就不能走後一條路，走後一條路，就不能不走前一條路，其實這兩條路，均能達到防共的目的，可以當做方法的兩個階段來看，不但不衝突，並且是前後相呼應。何以呢？因爲如果不走前一條路，就沒有

建築走後一條路的基礎；不走後一條路，則前一條路也就不能持久。所以這兩條路，只有緩急的不同，沒有矛盾之相左。」（『消除社會不平與防共』，『言論輯要』八冊）

閻錫山原來是公然主張以法西斯蒂的方法爲反人民反民主的基礎，而以所謂『農業社會主義』爲其補充的（關於他的所謂『農業社會主義』，見下面的分析）。他在抗戰前許多演講中，總是那末熱心介紹德意兩國的法西斯蒂反共的瘋狂運動，又那末驚嘆地說：『遂有今日之德意兩國的政權的出現！』『遂有今日之德國政權。』閻錫山及中國境內和閻氏同類型的政權（內容如『中國之命運』一書所說），實際上是中國式的法西斯政權。

在中國人民中間有極豐富的潛存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又有以中國共產黨爲其中心代表的現代的民主主義的力量，並沒有跟隨閻錫山（及其同類）在抗戰前所倡導的法西斯蒂『防共』的路，而是和中國共產黨在一起，走上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和民主主義的道路。日寇大規模打進中國本部領土上來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抗戰爆發了，情況的發展，不能使閻錫山專心做反共的工作。日寇大隊且到了山西，威脅了他的『

無條件存在」，這時他進行了抗戰的投機，與共產黨及進步人士合作，表現要「進步」，並採取共產黨的一些號召，作為「爭取民衆」的資本。但是大家知道：閻錫山也是有一套「以不變應萬變」的哲學的，他這個哲學，據說一部份叫做「母理」，一部份叫做「子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母理是永遠不變」的，變的不過是他的「子理」。他的「母理」是什麼呢？就是「鞏固政權」，就是「生存與自固」。他的「子理」是什麼呢？就是「應付一下抗戰」。因此就要和共產黨進行一定限度的合作，同時，在日寇那裡仍留了後路，即是「親日亦未嘗無益」（因此，就要繼續佈置反共的工作）。他的「子理」是不能夠離開他的「母理」的，而且只能以維持他的「母理」為目的。抗戰的困難越增加，敵人的誘降越積極，他也就越來越不成話了。這樣，不管他表面唱些什麼「民族革命」的詞句，有些時候甚至「激烈地」唱過，但骨子裡面所緊張的，却是另一回事。政權、政權、寡頭、寡頭、專制、專制，這是閻氏全部活動的總目的。為此目的，他竟認為利用敵人來「肅清」八路軍和決死隊（即山西新軍）是「靈活策略」，他和敵人早已有了解，並已有了秘密的協定。敵人答應他在一定時機可以讓他回到太原

去。卽如他現在的晉西地盤，也是敵人和平地讓他住足，作爲『防共』的試驗區。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實。維持政權和『防共』，本來對於他是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現在對於他更是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不過在他看來，他的政權已不能只限於單純的『鞏固』了，他還需要『開展』，因爲山西在抗戰烽火中已建立有多處民主主義的政權了，所以還需要向這些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卽向共產黨領導抗戰實行民主的地方『開展』，才能達到『收復』他原來所壟斷的山西政權的目的。總之，不論『鞏固』也吧，『開展』也吧，都是聯繫在勾結日寇、反人民、反民主、反共這一着上的。這已成爲閻氏整套的邏輯。

且看他那裡最近大吹特吹的所謂『兵農合一』吧。那裡訂的『全面突擊競賽開展辦法』，開宗明義第一條所列的目的，乃是『開展政權』四個大字，並不是旁的什麼字句。還再看他自己對於實行『兵農合一』的真正目標的說法吧：

『你們對實行兵農合一，不只不敢認成是個補兵問題，就是認成是實行我們主張也不够，我們這是打破地下組織，鞏固我們組織，惟一的好辦法。』

看他又說：

「我們今天如果摧毀不了他的地下組織，打不破他的基幹小組，就不易開展。但我們今天有什麼辦法，可以摧毀他的地下組織？……我們是要拿上實行兵農合一來打破他。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打破他！如何打破他的基幹小組？就是要用上堅強的狙擊小組來消滅他，他好比是個撈魚鰻，我們是打獵的，一定很容易的打破他！」（上面所引均見本年三月間閻氏在『徵糧會議上的講話』）。

這是什麼！大家看，山西的這個『打獵的』，不去打日本人，却去打『撈魚鰻』，却去打『他』。山西的『堅強的狙擊小組』，不去消滅日本人，却去消滅『他』，却去『摧毀他的地下組織』。在這些不在報紙上發表的話中，比起他對記者團談話時所說的：『捉到共產黨，訓練三天放回去』，『八路軍打我，我忍耐不公佈』，似乎有很多仁義道德似的，這裡就一點仁義道德的影子也不見了，看得見的，盡是對人民對共產黨的萬丈殺氣！閻氏的所謂『他』是什麼呢？『他』就是人民，就是和人民在一起進行抗戰、建設民主的共產黨。閻氏的所謂『地下組織』是什麼呢？那就是人民的抗敵民主組

織和支持這個組織的共產黨。他所要打破的——據他自己的話——就是這個「他」，並不是敵僞。他所要消滅的，就是這末一種組織，並不是敵僞。閻氏所做的事情竟是這末爲親者所痛，而爲仇者所快！他的「兵農合一」，竟是這末從仇視同胞和從事內戰的動機而提出的！

還有，什麼叫做「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以打破他」？還在一九三九年，閻錫山在秋林開幹部會議，準備襲擊新軍之時，他就告訴人們：「快要下雨了，準備雨傘罷，」就是說快要投降了。「大雨普下」卽所謂「全面和平」，他歷來估計，總有那麼一天的。他認爲到了這種時候，對於共產黨，「很快的就可打破他」。作這種想法的，中國不只他一個，還有其他的人。然而時局的發展，不是「大雨普下」，而是日麗中天，一定要打倒日寇「無條件投降」，這也就成了閻錫山這批人的永遠的悲哀。

要問：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的主要矛盾何在呢？要問：爲什麼我們共產黨人特別受了閻錫山那樣的攻擊和仇視呢？問題的出發點就在於：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在思想上、實際上有完全不同的出發點。我們共產黨人思想和實際的出發點，乃是解放民族和

解放民衆。我們在政權問題上的一切採擇，全部是以此爲出發點，以此爲標準。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誡我們共產黨員：如果我們這個黨不能替民族人民辦好事，這個黨就是毫無用處的。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一個極著名的演說，而且被日寇認爲最可怕的演說，其中有幾句特別重要的話是這樣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他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他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他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思想，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實際。共產黨人和閻氏主要矛盾的出發點，就在於：共產黨無私利可圖（因此，堅決抗戰，解放人民，政權是人民所共有），閻氏一類人們則唯私利是圖（因此，認爲『親日亦未嘗無益』，束縛人民，固執着自己寡頭專制的政權，反對人民過問）。他們的攻擊共產黨，也就在於共產黨不圖私利。假如共產黨也是圖私利的，他們也就不會對它攻擊了。

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精細的算盤上，把壓在人民頭上的特權放在惟一的心思上，真實就被顛倒了，是非就被顛倒了，人民的擁護者就被看成『欲拔之而後快』的眼中釘了，

造謠就被當成攻擊人民擁護者的得意工具了。閻氏說：

『宣傳與鬥爭不同，把自己的好意叫人知道，把別人對自己的誤會給人解釋明白，這叫做宣傳，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做鬥爭。』『我們的同志要將宣傳和鬥爭分辨清楚。宣傳有時可以不作，鬥爭一刻不可放鬆。不但不放鬆，更要以鬥爭對鬥爭。』（『革命行動』十卷十期）

這是閻氏鬥爭哲學的一部份。閻氏認為：『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是『一刻不可放鬆』的。他就是這末來對付共產黨的，而這回對記者團的談話，竟親自出馬了。對於我們，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這不過是兩隻眼睛只注在自己所壟斷了的私人政權，而絲毫不以天下、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前途為念的一切人們所必採取的手段。閻氏這個『鬥爭哲學』所告訴我們的，却正是：凡是閻氏所說『自己如何好』的，一定是不好的，因為如閻氏所說，這些都是『故意製造謠言』。而他們所說『別人何如壞』的，一定又是很好的，因為他們所說的『如何壞』，又不過是『故意製造謠言』而已。

就讓事實來證明吧！就讓山西的老百姓來表決吧！

以下我們要檢查一下閻錫山的『經濟計劃』和『政治計劃』的各種事實，來看看他從上述的出發點而實施在這兩個方面的具體結果。

二 閻錫山的『經濟計劃』

閻氏最近對記者團大吹特吹他的所謂『兵農合一』。他是這末說的：『根本上共產主義對勞動者是『先甜後辣』，與人土地，收上的糧食再行分配，無論如何巧妙的說法，根本的政治心理就得不到人的同情。我們是按勞分配，對勞動者是盡甜無辣，與人土地，不收人的糧，使人負擔，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好吧，我們且按下閻錫山的所謂『共產主義對勞動者先甜後辣』，下面再說，先看看他的『盡甜無辣』吧！

閻錫山所謂『盡甜無辣』的『兵農合一』，按照他自己所述，是這末一回事：『兵農合一』，就是把役齡（按：指從十八歲到四十七歲）壯丁，每三個人編成一個兵農互助小組，……其中一個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受優待，其中兩個當國民兵，在家種地或做工優待人。

同時，當國民兵的，再與村中其中有勞動生產力的一至三人編成耕作小組，以國民兵爲主耕人，其餘爲助耕人，每一耕作小組分配地一份，由耕作小組合夥經營耕種，按勞動力分配其勞動生產的成品。

因此，還必須劃分份地，即把村中所有土地，按照年產量純收益二十石小麥或小米爲標準，平均劃分成若干份地分給耕作小組耕種。

至耕作生產品的分配辦法是：一、田賦征購及村攤糧等抗戰負擔，約佔耕作小組全產量百分之三十；二、地租按糧產正額數向地主交納，約佔全產量百分之五；三、種子肥料等一切鋪墊開支約佔全產量百分之十五；四、餘糧約佔全產量百分之五十，作爲勞動報酬，由三助耕人合謀商訂分配享受。此外，每個當國民兵的主耕人，對其兵農互助小組中受優待的常備兵，每年約負擔小麥二石五斗及棉花五斤，作爲優役，故每一常備兵每年可得優待之小麥五石棉花十斤。」（閻錫山：『澈底實行兵農合一』，『革命行動』九卷二期）

閻錫山說：『這個辦法，不但我們中國從來沒有，就是世界各國也沒有，這是我與大家想下的』（『革命行動』八卷九期二頁）。虧他這一『想』，竟想到把從前俄國沙

皇東縛農民的份地制度拿了過來，閻氏的偉大也就可知了。

當然，閻氏的偉大，也還是有的。他這個『偉大』，是從他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來取得的。

爲什麼說是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呢？因爲依照閻氏的辦法，不但不能使得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而且更使得農民只好依附於一定的和固定的大地上。不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還保留，而且人們的人身、營業、財產、生活也更進一步地因受了嚴格軍事的政治的控制，而完全失掉了自由。且看下列的一堆事實：

第一：拿份地範圍了人，卽所謂『以生活管理了他的行爲』。除了編組當他的軍隊的準士兵以外，再不分別人耕種土地。『劃分之份地，非國民兵不准領用』（對『劃分份地問題的解答』二三三。『革命行動』九卷十期）。

第二：隸屬份地的『國民兵』所領的地，是不能越份地的固定界限的。『一個國民兵不能領兩份地，如份地有剩餘時，可按照規定辦法實行借耕』（答三。『革命行動』九卷三期）。

第三：所領的份地，不許變大，只許變小，『如份地不足國民兵種時，准兩個國民兵領一份地，不准輕易離村』（一三答。『行動』九卷六期）。

第四：婦女因爲『無當兵的必要』，就剝奪了她們領地的可能。『男人領地，尙感不足。如婦女領地，勢不可能。且中國今日尙無提倡女子當兵的必要，希轉飭各級幹部遵照』（二七九答。『行動』九卷十一期）。

第五：縱使是『國民兵』，但因生活所迫而他往謀生就被剝奪了土地。『因生活所迫，携家他往未回者，按規定不准領地』（二六五答。『行動』九卷十一期。按：這是回答以下的問題：『襄陵縣國民兵，已有因生活所迫，携家到他處謀生者，如何辦？』）

第六：一有改業，就不可能希望把份地當成謀生的後路。『中途改業者，奪田』（二四〇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七：不先交『優待糧花』，即不准領份地。（問：自額區貧役齡壯丁，擬准其領份地，收秋後，再出糧花，可否？答：不可。『行動』九卷八期）。

第八：『承受份地』後，要填『誓詞』，等於簽訂農奴契券。『誓詞』中有一條：『如期如數完納田賦，及徵賦食糧』（『行動』八卷九期）。

根據上述種種情況看來，閻氏一方面把農民變成他的份地的隸屬，另一方面把農民轉化為他的軍隊的隸屬。

閻氏不僅把農民和一定的份地聯繫起來（把農民束縛於一定的份地單位上），而且又把農民和一定的村界聯繫起來（即把農民束縛於一定的村界單位上）。除了上述『不準輕易離村』外，且再看下列的事實：

第一：把份地和人民放在村單位的基礎上，強迫劃分村界，使得份地和村界形成一條連環的鎖鍊，人民居住和謀生的自由更又都在這裡限制上了。『這回劃分份地，一定要先確定村界……土地人民均應以村為單位，離開村說土地，說人民，無從說起。所以今天一定要劃分村界』（閻氏在份地會議上講話。『行動』八卷十一期）。『村界非劃分不可，不劃村界，等於沒有村政，會後可由區派員會同強迫主持，不服從者懲處』（二三〇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二：領有份地的以在固定的村入籍爲限。『劃分村地後，仍應到某村入籍，不願入籍，卽是不願種地』（二四四答。『行動』九卷十期）

第三：採取屬地主義，不准越村籍耕種；耕種別村的土地，要由這個村籍依法轉入別村的村籍，『應採屬地主義。張家莊人民願種稷山境內土地者，得請求改入稷山籍編組領地』（答三一。『行動』九卷八期）。

第四：不准越縣籍耕種；耕種別縣的土地，要由這個縣的縣籍轉入別縣的縣籍，而且是以本縣『地不敷種』爲限。『仍按屬地主義辦理：汾陽小圈村鄰近孝義，其耕地多在孝義境內，地不敷種，准向孝義請求入籍編組，領種份地』（十四答。『行動』九卷三期）。

第五：離村他往，不出本縣，要回村編組領地的，如有保證，可准，已出本縣的，就不准再回來。『移住村不離本縣者，如人保證其確能回原村編組，准之；移住村已離縣境者，不准』（答三一。『行動』八卷十期。按：這是回答以下的問題：『移駐他村他縣人民，願回村編組，應否照准？』）。

上述的一切告訴了我們什麼呢？那一切告訴了我們：閻錫山在那裡建立新式農奴制度；閻氏明明白白提出他的農奴制度的名稱，叫做『屬地主義』。根據他這個屬地主義，農民獨立的人格變成份地的人格了。農民的自由經濟完全被取消了。這是超越古今極端反動的、軍事的、官僚的國家農奴制度。因為他這種農奴制度是以隸屬於軍事和官僚的直接控制為其特徵的。閻氏的確不愧是從前俄國沙皇實行『份地』制度的高門弟子，而且青出於藍了。根據閻氏的計算，他這個份地制度實行了以後，第一，『打仗的人多，可以保社會的安寧』。閻氏所以要『打仗的人多』，並不是爲着抗日，而是爲着『保社會的安寧』。所謂『社會』，就是他這個新農奴制度社會。第二，『種地的人多，可以保社會有飯吃』，閻氏所以要『種地的人多』並不是爲着發展農民生產，而是使他這批新農奴主們可以繳獲更多的糧食（以上引文，見『行動』八卷十一期）。據閻氏看來，如此就可高枕無憂了。你看他這末得意地說：

『此次我們實行兵農合一，等於把家裡堆的一堆錢，拿串子一串一串的串起來，不只是好處理，而且好使用。也等於百川總匯於海。所以今後政治上的管理也好管理了，

並且我想大家也一定可以感到今後在努力上有了目標。『兵農合一等於手掌，組（組織）政（政治）軍（軍事）教（教育）經（經濟）等於五個指頭，手掌作了五個指頭的根據，就可掌握運用屈伸自如，我們深信將來一定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一切復興上的工作統有了着落』（三月二十六日，朝會講話，『革命行動』九卷八期）。

閻氏把農民當成錢貨，份地當成串子，拿份地把農民『一串一串的串起來』，就以爲『不只好處理而且好使用』了。這樣，就不怕他們不『拿出錢來人來』，而且『必須拿出錢來人來』（閻氏的話，『革命行動』八卷九期），也即是必須讓他拿出糧來，拿出命來，否則就取消了他的份地，不給全家生活。中國古代封建制度，還有『罪不及妻孥』的，但在閻氏制度下，那就是懲罰一人，餓死全家了。既不怕人民不拿錢來拿命來，當然他之『組、政、軍、教、經』也就有了辦法，可以把人民耍弄自如了，這就是他的所謂『定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而據他自己看來，復興他在山西的私人政權的工作，因此也就『統有了着落』。

閻氏不缺×拿命來，當然對於農民採取『一串一串的串起來』的辦法，對於整個社

會人等，他都準備這樣的做法。比如，他對於『編餘商官』（即他那裡原來做生意的一些公務員）就這樣規定：『如果原籍係我政權能達到之村莊，而又能實行其編制者，准其按規定找保返回原籍，否則不准，並不得到其他省份另謀工作』（『革命行動』九卷三期）。你看！連他編餘的部屬，謀生和遷居他省的自由也都被剝奪了。閻氏說：『不經許可的不准私自工作』。『工作上不依規定的，即奪其工作之權，發定期乞食證，使他改悔』。『拿上他的生活來管理了他，使他不敢犯罪，再拿上奪工作權來懲處他，使他犯罪以後，必須改悔；不改悔，無生活』（閻氏與高級幹部談話。『革命行動』十卷一期）。就是說：凡是不服從閻氏的規定的，都要被褫奪工作權；不服從閻氏的命令的，都叫做犯罪，犯罪不改悔，就無生活。我們過去只聽說有『褫奪公民權』，閻氏竟創造出『褫奪工作權』了。這是軍事官僚直接控制的工作與生活的連坐法。閻氏正是要把農奴制度實施到全社會上的。這也是不足怪的，閻氏所統治的社會既然是建立在農村封建份地爲基礎的新農奴制度上，那末，這種新農奴制度就會反映到他們所統治的各個角落上去了。

閻氏聽了我們的話或許是要生氣的，他一定要說他這個『兵農合一』制度是『實現了勞享合一，取消了剝削制度，執行了收負合一，取消了負擔的不合理和不公道』（見閻氏：『澈底實行兵農合一』），是實行『按勞分配』呀，是實行『農業社會主義』呀，怎樣會是新農奴制度呢？

是的，閻氏不是對記者們說嗎？他那個土地制度是『不收人的糧』的。不幸，他却還說有『使人負擔』這幾個字。偏偏不幸的，就是有這末幾個字。按照前面所引閻錫山自己公開承認的數目（不幸的，這個數字却又是絕對不可靠的，因為太少了）來說吧：他所規定的田賦征賦，攤派和地租已佔了農民全產量『百分之三十五』，除此以外，還有所謂優待糧花等等。這些當然是『使人負擔』。可是，照閻氏的特別邏輯看來，這樣『使人負擔』却是『不收人的糧』的，所以，『不收人的糧』也就是『使人負擔』。同時，閻氏的話又是道理的，因為『百分之三十五』的掠奪，照閻氏看來，是輕得太不成事體了，假如事實真的是這樣，那豈不是要算是『不收人的糧』了嗎？

必須把實際的掠奪和閻氏口中的掠奪，分別清楚，而且那裡的實際掠奪的數目，也

還不必要我們親自去調查，只從閻氏所辦的『革命行動』刊物上，也可以知道了。且看閻氏自己幹部的報告吧：

『孝義一二兩區，據城東數村指導員稱：該村土地每畝產量最高者小麥一官石二斗，最低者四官斗，平均約爲八官斗，每畝糧銀爲九分四厘，假定每份地六十畝，共計糧銀五兩六錢四分，應納地租、田賦、隨賦負擔，及調節全糧麥或米一官石，每兩七石三斗，每份地四十一石一斗七升二合，再加每份地飼料（按：這也是對閻氏政府負擔之一）三石三斗，種子一石九斗五升，共計四十六石四斗二升二合。按平均產量八斗，每份地可收糧四十八石，僅可餘一石五斗七升八合。假定每份地爲八十畝，可純餘三石二斗，假定每份地爲一百畝，可純餘四石八斗三升，如每畝產量以平均一石計算，則每份地八十畝，方可純餘十九石二斗，惟人民多不承認一石之產量爲恰當。』（六八間。『行動』九卷五期一六頁）

大家看！這並不是什麼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根據這裡實際的數目，農民被掠奪去的，一般竟達全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包括飼料在內，竟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優待

糧花還不算在裡面。按照閻氏的規定，每份地除了生產成本外，『純餘』是百分之五十，但根據這個報告：六十畝地的『純餘』僅可佔全產量的百分之三；八十畝地的，僅可『純餘』百分之五；一百畝地的，僅可『純餘』百分之六。絕大部分的收穫量都到那裡去了呢？都到閻錫山私人政權的倉庫中去了。但是，閻錫山說：這就是『不收人的糧』的『按勞分配』！這就是『勞動結果歸勞動者享有』！

閻錫山於上述報告的回答，是，他的幹部這種報告並不可靠。可是，在上述同一個地區，同時還有提出同樣的問題的，並且還是載在他的『革命行動』同一期上面。那裡說：

『孝義一二兩區各村糧銀每畝九分四厘，計每份八十畝，共有糧銀七兩五錢二分，除過負擔外，純餘不過二十官石，按去年實際產量，尚不够負擔』（六五問）。

閻錫山的回答，又是認為不可靠，認為這種報告不過是他們『做了偽裝份子精神俘虜以後的一個表現』。奇怪的，閻錫山的下級幹部的報告，竟然有那末多的報告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却只有閻錫山自己的腦筋。奇怪的，閻錫山下級幹部報告的不可靠，却

是因為這些報告是從下面反映來的，所以就闕錫山上面的計劃不相符合；而闕錫山自己腦筋的可靠，正是因為他的腦筋是由『古人』來的，所以就闕錫山的計劃完全相符合。闕錫山說：『古人九分四厘銀子的地，應該是能打一石八斗的產量，至多三十畝，就够一份。』現在每份地到了八十畝，竟說是『實際產量尙不能負擔』，你想：闕錫山怎麼會不冒火呢？

還有一個地方的下級幹部，也向闕氏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新絳縣劉建莊、永豐莊、中蘇村、南蘇村等村，地質特劣，各村土地，每畝產量均不足小麥三斗，而糧銀每畝均在一錢左右，每年收益，除田賦外，再無餘糧……』（二三八問。『行動』三卷十期）。

闕錫山照例回答：『按古人定糧，一錢糧銀的地，普通產量在兩石左右，該村等為什麼原因，成了如此情形。』就算他所說的『古人』是真實的吧，但闕錫山竟聰明絕頂到這樣：連農村土地生產力經過了他政權下二三十年的掠奪已經極端衰落下去，農民又無生產積極性，他都絲毫不知道。就是這樣，所以他那些『妙絕人寰』的、『其味無窮』

『的、花樣翻新的所謂『學說』也就從這裡產生出來了。箇錫山的妙處，就是他有一副古人腦筋，於是自然地從這裡流出了許多古怪東西來。

箇錫山似乎也知道『土地有好壞』的，所以，他把份地分成了七等二十一級。但他對於『好地種的畝數少了，用的人工少，種籽少，收的糧食多；壞地種的畝數多，用的人工多，種籽多，收的糧食少』（雖然『劃份地實施大綱』是這麼寫的）這類事情，却又似乎經常忘記了，特別是在要糧的計劃上和要糧的行動上忘記了。按照他告人：從一等一級地的每份地三十畝起推到七等二十一級，增加到一百五十畝的每份地。就是這樣，由三十畝的份地到一百五十畝的份地，所要費的人工、種籽、肥料，其間的差別已經是很大了。但情形還有更怪的。看下面的一個報告：

『大寧道教編村反映：所屬十三閭，地廣人稀，地質較其他處壞，每畝年產量，多爲一易（即歇一年再種）二易（即歇二年再種）地，每份地約有三四百畝，需手工較多，人少了，種不了，況該處水質太壞（俗稱拐流水），人在幼時吃了，不長高，僅發胖，漸變成矮子，高有三四尺，體力甚弱，每份不下三四百畝，如何耕種？』（三零七閭

可見份地竟有多至三四百畝的。這種畝數多的壞份地，事實上都是分給那最窮苦的農民耕種的。閻氏計算這樣多的畝數也可以有『五十石至六十石之間』的收穫量，因而他所給的負擔，也可以和那些前三十畝地的份地的，同樣徵收。至於種畝數很多的份地需要花費更多的人工、種籽等等，是都不放在閻氏的算盤之內的，因為在閻氏看來，這些對他都是沒有關係的，對他有關係的，只是各份的地同量負擔罷了。同樣地，在各村之間的土地好壞，因而影響到人工、成本和收穫量等等，或者有的村種地的人少了，種的地也少了，收穫量也因此更少了，這些對他也都是沒有關係的，對他有關係的，也只是各村的『均糧』（依照該村舊定的糧銀收糧）罷了。因此，這裡就又有閻錫山式的特別『公道』：『田賦負擔則懸殊甚大』。『份地畝數太多，耕作小組既種不了，負擔又感太重』（一五五問）。『份地多，糧銀重，負擔重』（二七二問）。『一樣產量的份地，甲村與乙村負擔不一』（八三問。以上見『革命行動』各期）。因此，這又值得閻氏自誇了：『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閻錫山治下的『人』，性情特

別不同，他們是『同情』於『糧銀重，負擔重』的。

可是，『同情』，閻氏自己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的。巧妙的說法也好，不巧妙的說法也好，實際的事情，總是那麼樣的。閻氏也知道這種什麼每份地除負擔和生產成本外可『純餘』二十石，實在是不能騙人太久，即是不『能得到人的同情』；所以後來在他那裡對老百姓說話，就不能不逐步減去其虛構的數量。有一回，他說：『總也教他能盡得到十五石糧食』（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革命行動』八卷九期），少了五石了。又一回，他說：『亦可得純收穫量十石』（三十三年二月，『革命行動』九卷二期），少了十石了。再過些日子，說不定還要減下來。這樣，閻錫山自己的古人腦筋，和他下級幹部的『不可靠』的報告，豈不有些接近起來了嗎？但是人們儘可放心，閻錫山決不會和他下級幹部一樣，說什麼『尙不够負擔』的，繼續撒謊是必然的。語不欺人死不休，是中國一切腐敗統治者的道德，一有機會，他還是要盡量欺騙。這回他不是利用了記者團對當地情況的隔膜，就大施其演技嗎？

中國農民大眾從來受舊統治者橫逆殘暴掠奪，以致失掉大部農產物，他們只好被迫

得去利用一些農餘的時間，從事各種副業，以延續其牛馬不如的生命。但是，在閻氏那裡，不僅如上述的那樣無情掠奪農民絕大部份的糧食，而且無情掠奪農民全部農餘的時間，叫做『義務勞役』，『定爲每人每日不得超過（好慈悲呀！）四小時，全年至多（好仁惠呀！）以百二十日爲限』（見『兵農合一施政綱領』）。即是說，除了常常備兵的不算外，農民還要以全年三分之一的時間爲閻氏這個新農奴政權作『義務的勞役』。連不能領份地的『役齡婦女，每日也須要服四小時的義務勞動』（『行動』十卷九期）。同時不准農民從事其他的職業，並以取消他的份地爲恐嚇，使他不敢離開土地。這樣，絕大部份的租稅掠奪，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勞役掠奪，又不准農民從事他業，三者夾攻，真是使得農民走頭無路了，這就是他的超越古今的極端反動性，他的統治基礎也就非常『鞏固』了。

閻氏拿了以這個『盡甜無辣』和『不收人的糧』的土地政策（即佔有農民全產量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和每日四小時——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義務勞役），來和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作比較，說共產黨『對勞動者先甜後辣』，『與人土地』又『收人的糧』。

寫到這裡，只好簡單地插一筆說一說我們這裡的事情。

不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有人民交公糧而政府收公糧這件事。但我們這裡的人民對共產黨領導的三三制政府的看法，和閻錫山那裡的人民對閻錫山私人政府的看法却不相同。首先，人民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交納公糧，是交給自己的政府和軍隊爲着抗日、救國、救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交糧是爲老百姓自己的利益，是爲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其次，各根據地都實行了減租減息，農民從地主那裡大大減輕了負擔，這在國民黨區域及閻氏區域都不肯實行的。又其次，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收糧是在從儘可能減輕人民負擔出發的。在戰事條件或環境困難的時候，收糧多些，但只要情況稍好，不需要多的糧，收糧就減少了。政府又盡量發展公家生產，發動軍隊自己生產，發動機關學校自己生產，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又其次，黨政軍盡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變工隊和合作社的組織大大提高了生產力，邊區『耕三餘一』的任務，兩年就可完成，人民達到了真正的豐衣足食。支差動員，盡量減少，會也少開，『不違農時』定爲政策之一。在這種種條件下，一方面，人民生活逐年改善；另一方面，糧稅負擔逐年減輕。

現在邊區全體人民負擔平均不過佔其全收入的百分之十四，而且全人口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民因為他們比較窮苦根本免稅。但照閻氏的說法，這就叫做『先甜後辣』，又叫做『給人土地又收人的糧』。照閻氏的想法，以為農民恰恰『同情』他所給的那百分之八十六以上負擔和全年三分之一時間的義務勞役，以及那不許改業的囚籠制度，反而不同情共產黨所給的這個百分之十四的負擔和豐衣足食的生活。照他看來，農民不會同情自己的解放，却反而『同情』自己的被壓迫掠奪，這真是十足農奴主的觀點。閻氏獨家出版的政詞典中所載詞彙，沒有一條與世人相同，這也名之曰『學說』，豈不令人作嘔三日！

請看看閻氏怎樣在吹噓他這個新農奴制度。他說：

『去年各縣歡迎新戰士入營時，新戰士都是踴躍前往，入營壯丁及其家屬都是十分欣愉，毫無痛苦表現。今年劃分份地時，中陽留譽村的人民說：「我們沒福修下好老子，可是我們今天修下個好長官，給我們自己一份大家產，也就如同自己的好老子；修下好老子，只能養活我們自己，修下個好長官，能養活全村全縣人」。所以兵農合一的制度下，不但沒有逃丁，逃兵，及綑綁入營等病象，反而能使人人歡迎，人人興奮，做到

打仗人多，種地人多，鞏固了國防力量，擴大了勞動生產，實現了勞享合一，取消了剝削現象，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閻錫山：『澈底實行兵農合一』）

他又對那裡的民衆說：

『你們看看，到那裡當老百姓，能得到這個便宜？到那個隊伍裡當戰士，能受這份子優待？』（『革命行動』九卷十一期）

啊！啊！阿彌陀佛！不知道山西的老百姓有了幾生幾世的積德，修下了這末一個好長官！

可是，我翻閱了閻氏那裡出版的各種東西，除了閻長官這樣自己稱讚自己外，也沒有再看到對閻長官更加歌功頌德的文章了，這又作如何解呢？

可是，像我們這些還沒有懂到閻氏的『真理』，或還沒有被閻氏『真理』所『戰勝』的人們，要發生點問題來了。

問題一：既然『兵農合一』是像『所說的』人人歡迎，人人興奮，爲什麼『國民兵』竟然『有不願意領種份地者』呢？（『革命行動』九卷九期，二一七問）

問題二：爲什麼『各村國民兵，有向村公所請求，自己願意設法交納優待糧花，不願意領種份地』呢？注意『各村』二字。（見『革命行動』七卷五期，五六問）

問題三：爲什麼『國民兵已有因生活所迫攜家到他處謀生者』呢？（『行動』九卷十一期，二六五問）

問題四：爲什麼很多地方『發生的現象，人民秘密合謀劃分份地，表面上應付政府，將來仍各自種自己的地，明分暗不分』，需要你去『打整』呢？（見『行動』九卷十二期，三一二問及其他閻氏文件。）

問題五：爲什麼『耕作小組之編成，因助耕人之勞動能力大小不一，耕作技術優劣不一，並與主耕人立場不同，領受份地後，雖加強政治管理，合夥耕種，亦不如樂於自動耕種收穫大』呢？（見『行動』九卷五期，六六問）

問題六：爲什麼有『國民兵，因聽說劃分份地，令國民兵領種，該兵恐種不了逃跑』呢？（見『行動』九卷十二期，三零七問）

問題七：既然你說：『當國民兵的有地種，且是很大的一份家產』，爲什麼『國民

兵領種份地，有頂替情事』不要你這份大家產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二一問）

問題八：既然你說：『過去在役齡之內的，總是說自己不及齡或逾齡，想逃兵役的義務，今日是十七歲以下的想充十八歲以上的，四十八歲以上的也想充四十七歲以下的，爲的是充常備兵可以受大的優待，當國民兵可以領一大份家產』（『行動』八卷十一期二頁）爲什麼你又會『感到矚目的太多』，希望發覺之呢？（『行動』九卷十二期，三零六答）爲什麼在一個編村就發現出隱瞞年齡的，有那末多呢？（『行動』八卷九期三十七頁）

問題九：既然你說：『這次實行兵農合一的結果，常備兵入營，歡欣踴躍，盛況空前，他的好處，真有意想不到的』（『行動』八卷十一期六頁）爲什麼往軍隊送時，竟會『有許多人是哭叫着』呢？（『行動』九卷四期）

問題十：爲什麼你說：『今天我們優待糧花的戰士，可以說兩個半上將不抵他一個』，而你竟然會聽說到有『個編村，有五六個編了組以後潛逃了的』呢？（『行動』九卷十一期十一頁）你說這是『太糊塗』，爲什麼糊塗的竟有那麼多，有的『新入營潛逃

的常備兵」竟然就這麼說：『把我補到那裡我也要潛逃』呢？（『行動』九卷四期）

問題十一：既然你說當了晉綏軍是那末幸福，爲什麼你那裡『多數幹部反映，部隊派飯吃糠，情緒異常不好』，『部隊已到瓦解的危險境界』呢？注意：這是『多數幹部反映』，這又是『已到瓦解的危險境界』呵！（『行動』九卷七期封面）

問題還可提出很多，但不在這裡估篇幅了。要知道，這些問題都還只是根據幾期閻氏的官報提出來的，如果到閻氏統治下的民間去調查一番，那就担保可以提得出千萬個問題來。根據上述閻氏的制度，我們可以斷定：這裡所提的各種現象，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行政上個別錯誤所引起的，而正是閻氏所建立的制度的必然結果。在那種制度下，這種現象必然逐步表現出來，而且會日益大量表現出來。

總之，實際的情況和閻氏的『巧妙說法』不一樣。那裡並沒有什麼『按勞分配』，而僅僅是『按勞掠奪』或『按人掠奪』。老百姓不同意這種『按勞掠奪』的，就被看成『叛逆』；閻氏幹部對於這種『按勞掠奪』提出疑問的，就被閻氏看成『做了偽裝份子的精神俘虜』。那裡『對勞動者既公道又適情，所以人人樂意勞動』（『行動』九卷六

期封面），但却是只准許在閻錫山一個人面前公道，爲閻錫山氏一個人適情，只准許『人人樂意』閻錫山的農奴式勞動。

閻錫山說：『劃分份地是實行按勞分配』（『行動』九卷八期六頁）。是的，這種份地制度，的確是把閻氏所謂『按勞分配』的真相切切實實地說明了。自從九一八前夜，閻氏躲在日本帝國主義租借地的大連，發明了一種什麼叫做『物產証券與按勞分配』的『學說』，隨後又在一九三五年河北事件之後把它公開以來，若干人士，對於這個以『孳孳爲利』、『投機取巧』著名的老軍閥，山西的大財主忽然以『發明學說』叫囂於世，不無覺得一些驚奇，雖然隨後又會覺得可笑，這位以當軍閥和官僚起家的大財主，對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學說，雖則毫無所知，連書都沒有看過，但不知道在那一天他忽然聽人家說過：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認爲共產主義包含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即是按勞動分配）；第二階段才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第一階段叫做社會主義，如衆所週知，是在蘇聯早已實現了，並且在蘇聯斯大林憲法上寫上了『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幾個大字的。閻錫山知道了這末一件事之後

，想了一會，竟心血來潮，靈機一動：啊！有了，雖然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主張先實行『按勞分配』，後實行『按需分配』，但我可以偷竊他的『按勞分配』名稱，算是我自己的發明，又栽誣他的『按需分配』，叫人駭怕，這，我反共就有本錢，馬克思主義就此可打倒了。於是他白晝見鬼，著書立說了：『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把勞動者的勞動結果，全拿上走了』（『行動』九卷六期封面）。『這是勞動人情中人人不樂為的，必須強制，強制的最後方法是殺人。這勞動者勞動結果，是繼續不斷天天要做的，就是欲貫徹共產主義的主張，須繼續不斷天天的殺人』（閻氏『言論選集』二輯二三頁）。『這遺於人類的禍害，可就太大了』（閻氏『言論輯要』八冊五四頁）。而他呢？『按勞分配』從此就是他的『發明』。又從此他就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批評者』自居了。世界上當面撒謊、頑鈍無恥的事，竟也有這樣的。我們生當這個無綫電發達的世界，每天聽到各種外國新聞，感覺快樂；但是外國人究竟沒有中國人幸福，如像閻先生這種『天天殺人』的土新聞，外國人怎麼聽得到呢？

但是也毫不奇怪。按照閻先生的哲學：『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

壞，這叫做鬥爭」。他『批評』共產主義，是屬於『別人如何壞』一方面，下面還有另一方面。

他說他這個制度，既『合乎公道』，又『合乎人情』，又『適於生產』，是『無一人行不通，故可以永久不變』。他說：

『井田之制，行之三代，大同之說，倡於孔子；後世學者亦多欲復井田意義之制度，惜有是志而無是力，不能見諸事實。假使有是志者得改造之大權，則「按勞分配」之制度，早實現於中國矣。』（『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六二頁）。

『吾國今日改革經濟制度說者多謂應取法西歐，此實爲民族失却自信力之表徵……吾觀井田意義之制度，既公道而能永久，大同理想之學說，復超越乎古今，倘吾人本其意義及其遺教，發揮光大，規定制度，使適合今日之實際，則所謂經濟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正非特可以救中國，抑且可以救世界也。』（同上，七五頁）

閻氏的『按勞分配』，是以軍事方法，恢復中國古代『井田制』爲目的。就這點上說來，他的主義是一種軍事的封建社會主義。他的所謂『農業社會主義』，就是遺末一

種軍事封建的社會主義。他想：他『既有是志』，又『得大權』，實現就該沒有問題了。果然，近年他和日寇實行和平共居之後，竟實現了這個『兵農合一』的『現代井田』，他說：

『我們中國古代就有井田制度，這制度實爲歷史上之至寶。歷代的多少聖賢豪傑力謀恢復這個井田制度，都是經過多少次的考慮，始終都不敢提出來實行，孟子也曾經極力提倡恢復井田制度，但後來也沒有得到實現。在共產主義者，恐怕出現了更比他好的主義，故意的說「中國古代並沒有井田制度，那是孟子造謠的話」。大家應知井田不是單純不剝削的土地制度問題，實際是個兵農合一，勞享合一，收負合一多方面的公道完善制度。……今天的兵農合一，就是現代的井田』（閻錫山『在份地會議上的重要訓話』）。

說來好笑：閻錫山竟然以爲我們怕井田主義比現在共產主義更好，所以故意否認中國在古代有個井田制度。據我所知：懷疑孟子關於井田制度的描寫的，先是一些自由主義的學者。至於『現在共產主義者』，倒是老早就發現了、承認了原始農村公社的存在

，並且在封建社會中，仍有它的遺留（在封建社會中，農村公社的遺留，對於地主的束縛農民在土地上有利的），而中國歷來所傳說下來的井田制度，則不過是這種原始農村公社的反映（雖則有些主觀）。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農村公社日趨瓦解，一去而不可復返。這是閻氏所謂『歷代的多少聖賢豪傑』和孟子等等主觀上想恢復而事實上不可能的真實原因。可怪的，據閻氏說：這種井田制度『既公道而能永久』，『合乎公道』、『合乎人情』、『適於生產』，爲什麼後來又不能存在呢？爲什麼歷來『聖賢豪傑要恢復者又不能恢復起來』呢？閻氏本來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他的哲學是『不問「是什麼」最後有個不可知，即「爲什麼」最後也有個不可知』（『物產証券與按勞分配』四五頁），他在這裡也只得用『最後不可知』來答覆了。但閻氏既然以爲『最後不可知』，爲什麼又能知道他的井田制度和他的『按勞分配』是『可以永久不變』的制度呢？

我們共產黨人是以人民的利益爲自己的利益的。如果真如閻錫山所說，有什麼別的主義比我們主義『更好』，那末，我們爲什麼要排斥它呢？事實絕對不在這裡。事實證

明：現代共產主義是最好的科學，最能造福於人類的科學，並沒有什麼主義比它『更好』。閻氏是反歷史主義者，只看到過去，迴戀已死了的骸骨。而我們共產黨人是歷史主義者，不但知道過去，而且爲人類現在的幸福戰鬥，更爲人類將來的幸福戰鬥。中國歷史發展到現在，社會發展到現在，古代井田是不可能再來了，就是閻錫山式的『現代井田』也必然很快死亡的。現在的中國正需要大大發展生產力，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而現在階段發展經濟的道路，正如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所實行的毛澤東政策，必須是經過農民的解放，經過經濟上、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也即是要建立以解放農民爲基礎的、以發展大衆經濟和大衆幸福爲目標的新式自由經營、新式自由勞動和新式自由市場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這也即是把農民變大，把生產變大。而閻錫山的『現代井田』，却是以束縛農民爲基礎的、以破壞大衆經濟和大衆幸福爲目標的反自由經營、反自由勞動、和反自由市場的新農奴主義——新鎖村主義的經濟制度，這也即是把農民變小，把生產變小。這是幾千年前的古董，死屍，一點生命力也沒有了的。它是阻止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歷史註定了它要很快地死亡。

閻氏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的危機這一點，在那裡像煞有介事地咒詛着資本主義，但他是從恢復過去封建農奴制度的「光榮」，去咒詛資本主義的。其次，他又是文不對題地去咒詛資本主義，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的主要危機還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却是生產不足的危機；而這種生產不足的危機，正是由於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而來的。現在中國人民所遇到的民族壓迫、封建壓迫和官僚資本統制的壓迫的痛苦，却遠大於所遇到的資本主義壓迫的痛苦。現在中國類似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對於德國所說過的：

「……：德國是像西歐大陸各國一樣，不僅受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苦，而且受資本主義生產不發達的苦。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種種痛苦，還有許多舊傳的痛苦，壓迫着我們。這種種舊傳的痛苦，是古代生產方法依然殘存的結果，而這種古代生產方法的殘存，自然引起種種時代錯誤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我們不僅吃生者的虧，且吃死者的虧。死者叫生者煩惱。」（『資本論』一卷初版序）

又類似列寧在一九零五年對於俄國所說過的：

『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度裡面，工人階級感受資本主義的痛苦，遠遠不如它所感受資本主義發展不夠的痛苦。因此，工人階級絕對需要資本主義最普遍、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消滅國內一切障礙資本主義普遍、自由和迅速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於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兩個策略』）

我們是科學共產主義者，正因此，我們承認資本主義之一定的歷史進步性，承認自由商品經濟之一定的歷史進步性，這種經濟，比起封建買辦經濟，發展起龐大的社會生產力，生長起最新型的社會勢力，作為推動歷史繼續逐步前進，走向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最近社會的偉大動力。但閻氏和其一型，如『中國之命運』一書所代表的人們，則完全相反；他們完全否認了這種自由經濟的進步性，而只歌頌過去的封建時代的政治經濟。他們否認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如閻氏之流，則主張封建的分地經濟，鎖村經濟。雖則閻氏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是主張互通有無，使『需供各得其利』的『交換經濟』，而反對『封鎖經濟』（見閻氏『中日經濟提攜問題』，『言論輯要』九冊），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自由市場（也即主張把中國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市場），閻氏

對於人民則主張相反的東西。現在在他統制的地區，竟要人爲地取消了自由商業。他的井田主義正是『小國寡民』『死徙無出鄉』的鎖村主義，而用軍事方法來約束它。他的『社會主義』就是鎖村的軍事封建社會主義。這種軍事封建社會主義，不過是上述軍事的官僚的國家農奴制度的別名罷了。這完全是反動的東西。不錯，閻錫山也主張辦工廠，但一方面他仍主張村是經濟單位，另一方面他又是主張以今日在營的常備兵或輪到的常備兵去担任工廠的勞動，換句話說，他主張的工廠不是建立在自由勞動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自由勞動之上的。這種不自由勞動又正是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

這裡要稍爲說一下閻錫山的物產證券。因爲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他這個奇論提出過批評，並批評得很好，特別是關於貨幣發展史方面，所以我們在這裡不準備多說，只說一點事實罷了。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國民黨政府公佈法幣制度，停止兌換現洋以後，閻錫山旋即在山西成立『實物準備庫』，打算『以省鈔向人民購買長餘的物產。……增

發省鈔，發出省鈔一元，即收回一元的貨物」（二十五年二月，閻氏關於「實物準備庫成立的動機和辦法」）。『人民拿值一元的貨物到準備庫裡可以換得一元省鈔，庫中收了若干貨才發出若干鈔票去，有一元的省鈔發出，庫中就有一元的貨做準備，所以可稱為準備十足』（閻氏『爲設立實物準備庫事告山西商民書』）。這是實物準備庫的『買進』。賣出呢？『又規定賣物價格，只准（？）至多按成本加千分之三十五的手續費』。『準備庫往出賣物，只准（？）按原來買入時成本加千分之三十五的運輸費和手續費』，如此，人民照原價格加高一點向準備庫購買……『虧閻氏說得周到：人民可用實物向他換省鈔，但却不能用同量的省鈔去向他換回同量的實物。當然，這裡所說要增加的數目字，還是謙卑得很。

事實上各種貨物從人民的手裡拿到政府物庫中去，將是不能再從政府物庫中轉到人民的手裡的。據閻氏說：『就政府方面說，實行這個實物準備庫的辦法，不但無利可賺，而且還是賠錢，因爲準備庫爲換回貨幣、活動金融起見，不能不將本省貨物運到外省去賣，要想這樣做，有時就非賠錢去出售不可……故實物準備庫成立以後，政府在

財政上須增加一筆支出，這是政府新的痛苦。」（以上所引，均見前面兩文件，閻氏『言論輯要』九冊）你看！好慈悲好苦痛的閻氏政府呵！實際上沒收了人民的物產，而給了他一條沒收的收據，閻氏自己這末說：『物產證券是收貨發券，等於百貨的價值收條，有貨多少可以開多少收條』（『言論輯要』八冊八十一頁），但把這沒收來的物產往外拋賣，換回貨幣，大發其財時，却又算是賠錢了。賠給了誰呢？那只有天知道了。這就是閻氏『物產證券』的實際秘密。但是：大概山西人民那時還沒有感謝他這個『政府的痛苦』，而竟加以抵制，所以就不見下文了。

按照閻氏所說：『農工商生活這樣不安全的原因，是大洋貨幣制度造成的。』（『言論輯要』八十頁）而閻氏的『物產證券』，按閻氏本來所規定：是經過政府『賦予貨幣資格』，『其尺度單位仍沿用已往貨幣七錢二分之銀元單位，其名稱仍應稱爲元、角、分、厘』（『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十一頁）。那末，自從實行貨幣制度、停止大洋兌換以來，可以說：你的主張業已實現了。但爲什麼在你及你的同類者所統治的區域，農工商生活的不安，不但沒有消滅，而且沒有減少，而且還在繼續大大增高，那末你的

『偉大學說』的『偉大』却到那裡去了呢？

閻氏關於『物產證券』根本思想，是從利用小生產者對於市場的隔絕，他便於便宜佔取和壟斷他們的剩餘生產品而出發的。就是說：閻氏的『物產證券』不過是向人民強制徵發的一種形式。自從實行了『兵農合一』，已經那樣掠奪了直接生產者的大部分生產品，又迫令他們每年做三分之一的『義務勞役』，那末，似乎可再掠奪的東西已不多了。因此，閻氏說：『兵農合一的實行，可以說是超過了物產證券的效用』。『……物產證券如禹之治水，能行其所無事；兵農合一根本將水源堵塞了，當然用不着治水了』（『行動』九卷八期二頁）。他是想說：經過『兵農合一』，已把人民的物產直接徵發得那末徹底，似乎已用不着那種作為徵發人民物產的工具的『物產證券』。但是，事實上，他那裡還有一種所謂『合作券』。這種合作券，在閻氏官家拿來對人民時，拿來向農民購買『餘糧』、向手工業者購買生產品、向農家婦女購買手工業品時，是『實物證券』。但人民拿去對閻氏官家時，却不准當實物了。比如：人民要用合作券交優待糧花去領用份地，是不被允許的，交糧更不必說。（按：有人問：『受優待人可否以合作券

向民調處買糧？」『應出優待糧花，是否仍交合作券？』閻氏答：『可以產品換糧花，仍應交糧花現品。』（『行動』，十卷八期）。對於可否以合作券向民調處——即閻氏官辦徵購人民糧食的所謂『民食調節處』——買糧，閻氏就不予回答了。）只要人民那裡還有可絞榨的東西，閻氏是不會放鬆一手的。

閻氏所從事堵塞人民的水源，是不能終久堵住的，一旦人民的大水橫決出來，看你閻錫山要怎樣呢？

總的看來，閻氏的『經濟思想』，本來是山西落後農業經濟和小生產經濟在代表大地主大壟斷商人這個統治集團中的反映，他的出發點就是在於鞏固這個代表大地主大壟斷商人的軍事官僚統治集團的利益。他的『兵農合一』乃是利用抗日戰爭的條件，在最落後的經濟地區，那裡自然經濟和家長制經濟原來盛行，加上地多人少，而進行的。以閻氏爲大家長的這個山西老軍事實僚統治集團，在抗戰的烽火中，企圖維持自己從前竊得來的統治權，一方面，『親日亦未嘗無益』，另一方面，必須向人民要糧要命，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兵農合一』的計劃。這個計劃，把大地主大壟斷商人的某些利益轉移到這

軍事官僚統治集團手中（如地租的某一定部份由地主之手轉移到閻氏這軍事官僚統治集團之手；大商業壟斷由某些個人之手轉移到集團之手），正是爲的便利對於人民的統治，便利掠奪直接生產者，並便利犧牲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屈服他們來服從這個統治集團。同時，這又是由於大地主大壟斷商人自身及其家庭屬員，大部分都加入了這個軍事官僚的統治集團，成爲這個統治集團各級大大小小的一份子，充當其中各級軍事官僚機構的大大小的首長或人員，所以，某些利益轉移到這個統治集團手裡，就等於又轉移到自己的手裡，而這種轉移，可以使他們對人民統治權更加集中，正如閻錫山自己所說，對於他們是有很大好處的。但是，經過閻氏這種苦心經營，施行未久，連閻氏自己也有『好事多磨』（『行動』八卷十一期）之感了。這種違反歷史、違反人心的措施，雖則閻氏自己以爲『能在廣大農村的經濟基礎上，紮下堅固的基礎，這個力量是永久不能消滅的，也是永久不可戰勝的』（『行動』九卷二期），但歷史的發展必將很快使閻氏這種幻想化爲落花流水，那是完全可以預卜的了。

最好是由閻氏自己先來做些結論吧！

本年三月間，閻氏對他的下面幹部說：「我近來最感不快者，即兵農合一之下，入營的新戰士逃的不少。」

本年七月間，閻氏又自己廣播說：「因各縣辦理兵農合一不力，損失我戰鬥員兩萬人。」

換句話說：閻氏實行「兵農合一」之後，不是如閻氏所說的打仗的人多，而是打仗的人少了。份地和鑽村要束縛農民，但是，農民却是要努力逃脫這個束縛。

閻氏不了解這種道理，他說：「兵農合一之下，不應該再有逃兵，如果有，是等於太陽從西方上來，因為潛逃了的，除已享受的優待糧花必須退出外，還得編組優待人，並且領不上份地，被捕獲後，服役無年限，不但自己無辦法，且連累的全家無活路，真太危險了！」可是：太陽終究是從東方上來，而不是從西方上來。你越要用各種辦法束縛「兵農」，而「兵農」却逃跑的越多越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個老子哲學，倒被閻錫山真忘記了。在閻氏的「兵農合一」之下，如果兵農不逃亡，那就不合理了，那真等於「太陽從西方上來」了。如果大量逃亡，那就合理了，那恰是等於

太陽從東方上來了。

至於閻氏「取消商業」的結果又如何呢？閻氏是說他已「廢了公私商業」，事實上他是想要廢除私人商業，官商却還是存在，並且更加集中在他做「局長」的山西省經濟管理局和各地官辦「合作社」之下吧了。但是，私人商業是否因為閻氏的「廢除」而不存在呢？且看閻氏自己說的吧：

「我們某種物價比黑市還貴，這樣，你如何保證無黑市」呢？（『經濟動力』第二期）又：該刊載有『第二期經幹部訓合作部門對黑市問題討論總結』說：『定價不合理』、『黑市比我們價低。』

這是說的什麼呢？這是說明了：閻氏官家商業（號為「合作社」）的官定壟斷價格，是如何的高，私人商業所定的價格要低得多了。這又說明了：不管閻氏的官家是如何的在那裡「實行檢舉、突擊、保證做到無黑市」，「展開反黑市運動」，以求保證其獨佔的價格，但人民則仍在「地下」冒險進行自由的貿易。那種人民反對閻氏官定高價的壟斷價格，進行自由貿易的黑市，要算是進步的「黑市」。

閻氏說：「我們的新經濟制度是管理經濟」（『行動』十卷八期），也即是新農奴經濟的別名。但是山西人民究竟沒有被『管理』了，也『管理』不了。他這個『管理經濟』的必然破產，還有疑問的嗎？

閻氏自稱他這個經濟計劃是創造『公道森嚴的新社會』，這兩個字『森嚴』，使得我想起閻羅王主宰陰間地獄的『森羅殿』來：閻不過是把他那殘酷兇暴的陰間地獄轉化爲人間地獄而已。但是覺醒中的山西人民必定會打碎他這個活閻王的森羅殿及其人間地獄，還有疑問的嗎？

三 閻錫山的『政治計劃』

第一個部份，我們曾經提到了閻錫山的政治企圖；在第二個部份，又用較長的篇幅論述了閻氏的經濟計劃及其實際措施，那末，他在政治上走的什麼道路，弄的什麼計劃，已經可以呼之欲出了。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二月，閻氏向晉綏軍官訓練團這末歌頌了希特勒：

「剛才我聽到報告：德國元首希特勒，最近在國會發表演說，向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我因此感到飛機式進步的國家進步之驚人。」

「……最近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想說甚就是甚，英國的張伯倫、法國的達拉第以及美國的羅斯福的奔走和呼籲，可以說是都是爲了應付他們，這是什麼原因？就因爲他們有現代化國家的組織，有力量，進步的快，成了現代化的國家」『走上飛機式進步的路子』。（『言論選集』二輯）

你看！他是這末稱讚了希特勒、墨索里尼這兩個法西斯妖魔。他認爲希特勒『向全世界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這種瘋狂的侵略要求，是『驚人』的『飛機式進步』。他歌頌這兩個人類劊子手『說甚就是甚』。照他看來：法西斯的國家組織並不是最野蠻最橫暴的組織，而倒是『現代化的組織』了。法西斯並不是把他們的民族國家野蠻地拉向後退，而倒是『進步的快』了。在他『手諭』爲訓練縣區村幹部教材的『現代國家的國民』中，到處稱讚了德意日法西斯三個國家，比如，那裡說：『希特勒這次作戰，在德國國民的精神大部是拿上雪恥報仇去鼓吹民氣』。『德國的士兵及國社黨軍人，就沒有信

希特勒能打敗仗的，無論在如何的困難中，他總說希特勒有辦法，完全聽希特勒的指揮。『天津日租界有個「天津報社」，這裡邊立的十個大石碑，上邊刻的金字「日清戰役紀念碑」（甲午之戰），碑拿鉄鏈纏着，這碑前有一池沙土，係給兒童玩沙設的一種遊戲，意思是讓他日本小孩常時紀念留印象，每早初經過此門前的人，都要向碑的方向，脫帽鞠躬敬禮」。……諸如此類等等。對於侵略者毫無仇視的觀念，而且竟拿這些鼓勵法西斯侵略的東西去做教材，說這些東西就是『現代的國民』的模範，企圖在閻氏的統治下培養法西斯的奴才，對於日寇在我國領土內建立戰勝我國的紀念碑，不但不以為恥，而且在那裡那末津津樂道，這就真不知是何心肝了。

意大利法西斯強盜的統治業已在去年坍塌，這對於閻錫山是不會不知道的。可是，縱使法西斯坍塌以後，他還是不放棄對它的歌頌。比如，今年二月十九日，他的『朝會講話』，又這麼無恥的歌頌起來：『烏衣黨（按即黑衫黨）的黨員能人人保證意大利無盜案發生，且他們能下辛苦的藏在火車木箱中，破獲偷竊東西的人』（『行動』九卷六期）。閻氏是拿這些話去鼓勵他的所謂『革命團體』的『同志』的。法西斯本是世界最

大的強盜，但在閻氏看來，法西斯竟是強盜的對頭了。在全世界民主勢力如日方中，法西斯末日已臨的時候，閻氏不拿民主制度向模範去鼓勵他的『同志』，而却是繼續找法西斯去鼓勵他們，不正是證明閻氏始終一心一意地在追求他的法西斯制度嗎？

閻氏的『政治計劃』，完全是以法西斯為模範的政治計劃。他在那裡『建組織』的那一套，完全是抄襲法西斯的。閻氏那個掛『民族革命』之名，而由他自命為『會長』的所謂『民族革命同志會』，完全是侮辱民族革命、反民族革命的一種特殊法西斯組織。在那裡面，閻氏是具有絕對性和專斷一切的唯一獨裁者，那裡所採取的儀式，也完全是法西斯的儀式，例如：在閻氏統治地區，就有『集會及課堂中間稱會長時致敬之規定』。

『各種儀式之會議與群眾集會及課堂中，開第一次稱道×會長時，一律立正致敬，致敬畢，自行稍息，或坐下，若再開稱道時，可以整容致敬，不必立正』。

這些都是法西斯的鬼把戲。不僅如此，中國皇帝那一套把戲，閻錫山也用上了。例如，閻氏的言語或命令，都一律稱『諭』，他的部下見他就叫做『覲見』……等。你看！

儼然是一個偏安小朝廷（可憐！只有那末一點點小地方的芝蔴土皇帝！）的小皇帝了！

這個小獨裁者，爲着叫他的部下『等於臣子的身份』能够完全的受他控制，不敢『欺哄上級』，規定了具誓書自裁狀的辦法，如果沒有照狀上所寫的做，就勒令實行這種中世紀式與法西斯式的極野蠻的自裁，並且已有些人就這樣做了閻氏的羔羊。他甚至叫他的部下給他上誓書，說如果有人聽到諛謗『領袖』的話，就當場將他打死，不然，就須自裁。這真是專橫極了。他設置的特務網，不但層層地去監視人民，而且對他的幹部也是一層監視一層。照他自己對幹部們說：『……說到今天，我們組織的同志，人人是監督的，人人是密報的。……你在工作上的一切言行，組織上總會很清晰的知道，敢斷你一點也瞞不了。大家要切實猛醒，不要作了監獄之門內殺場之路上的犧牲者，大家千萬再不敢糊塗了』（『行動』九卷十期）。另一方面，又用他的特務實行所謂『突擊人』，要使他統治下地區的一切人，個個納在他的控制之下。閻錫山對那種被『突擊』的人這樣說：『突擊你是爲你堵監獄之門，斷殺場之路。……這正如你將有失足墮崖的危險，有人預先來拉你，真是你的救命恩人……』（『行動』十卷一期）。由此可見，

閻錫山在他統治的地區，已到處設起了『監獄之門，殺場之路』，順之者生，逆之者死了。

在人民中，閻錫山要造成一種對他這個特殊法西斯組織的神秘觀念。他『對國民兵常備兵訪問團出發人員』訓話：『你們這次出去，……第一要教每個國民兵腦筋中，統要知道組織，不惜三十次以上的和他說，給他腦筋中輸送組織的名詞，組織的意義，組織的力量，組織的效用，一定要使他切實印象了組織，認識了組織，信仰了組織。』『使他腦筋中認為組織是神聖的崇高的，使你們走了，他們也不知道你們是作什麼的，只是印象個組織派來慰問他們的』（『行動』九卷十一期）。爲什麼閻錫山要使人民對他這個組織形成一種神秘的觀念呢？因爲法西斯是需要把它的權威和神秘結合起來的；把它的權威變成神秘的權威，把它的神秘變成權威的神秘，這是法西斯統治人民的法寶之一，是它所用的刀槍劍戟的一種補充。

閻錫山把他的所謂『不容人不』的法西斯哲學，當成他這個組織的主要靈魂，所謂『不容人不』的實際，就是：不容你不這樣，不容你不那樣。換句話說，就是：強迫你

要這樣，強迫你要那樣。如果你不這樣，不那樣呢？也即是：如果你不絕對服從——盲從呢？那末，就有『監獄之門，殺場之路』在等着你，讓你『做豬羊』。據閻錫山說：『不容人不』就是『保險不做豬羊』（參考『行動』六卷四期）。所以，要實行『不容人不』，以避免自己做豬羊，首先是要以別人做豬羊為代價的。上述閻錫山的特務方法，就是『不容人不』的方法，就是『請君入甕』的方法。

或者是順從的奴隸，或者是犧牲的豬羊，閻錫山的政治計劃的精華，全在這上面了。

因此閻錫山斥責了他一些幹部『做了人民的精神俘虜』。他說：『我們的村幹部盡作了人民的精神俘虜。人民說甚就是甚。一個為政的人，如果盡做了人民精神的俘虜，就不能為政，也就是一天盡成了苦惱，做什麼事也要無興趣』（『行動』九卷九）。閻錫山的『不容人不』，正是要人民做他的精神俘虜的，應該閻氏說甚就是甚，而不應該人民說甚就是甚。但是，從閻錫山的斥責中，可見他不管如何賣力，他的法西斯組織究竟控制不了人民，甚至他統治下的村幹部也免不了受人民的影響，那類法西斯組織的

脆弱不也可想而知了嗎？

閻錫山把人們分置爲四等：

『一、人民：是組成國家的份子，不分種族男女老幼完全包括在內。

二、民衆：是人民能發生政治作用，表現政治行爲的。

三、羣衆：是由民衆中經過選拔而組織起來的，受組織的影響，支配和領導不在規律範圍以內者。

四、組織：組織是同志所集合，是在同一主張、同一目的、統一領導下，有領袖、有幹部、有羣衆、有主義、有政策、有政綱、有紀律、有政治行爲的集體。』

把次序倒過來，第一等人是閻錫山爲領袖的統治集團，以閻錫山的那個法西斯組織爲其代表，是全部政治的壟斷者；第二等人是已經受過這個法西斯組織的政治影響或麻醉的，是上述政治集團的附屬物；第三等人是能够起一定政治作用，可作爲政治的搖旗吶喊、助統治之威的；第四等人是絕對大多數，則完全排在政治之外，對於政治絲毫不得過問，只是純粹被統治的奴隸。

的確，閻氏把他在經濟上那一套新農奴制度完全反映到政治上來。他『巧妙』地、可笑地把人民、民衆、羣衆分裂爲三個不同的範疇，不同的等級。他說他要『建立民衆基礎的人心政權』，就是要建立以他那個統治集團的附和者爲基礎的農奴主法西斯主義的政權，在這政權下，人民（卽第四等人）是完全被統治的，是完全沒有發言權的。

正如我們在他的『經濟計劃』上所看到的，他這個新農奴制度乃是反動的份地制度和鑽村制度；而符合於他這個新農奴制度的政治，也正是以村爲統治的基本單位：他們要『在基礎工作上做到：健全全村支部，統一村組織』。閻錫山這個農奴主法西斯主義就是以鞏固他經濟上的新農奴制度爲其目的。閻錫山那一套經濟上的新農奴制度，就需要有一套政治上的農奴主法西斯主義去加以控制。

閻錫山還要不要『人民』呢？當然還是要的。牛馬都要，爲什麼人民不要呢？沒有人民，還有什麼農奴和士兵呢？沒有人民當農奴，誰去耕地呢？那裡得有糧草呢？沒有人民他還有什麼可供給統治的呢？他如何得成爲土皇帝呢？

但是：閻錫山却死記着孔夫子的愚民哲學，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他的口號是：『拿起人民來』。就是說：人民只是可以『拿起』的，即像死的工具一樣，是可以『拿起』的，而不能是『喚起』的。『拿起來』做什麼呢？拿起來掠奪，拿起來奴役，拿起來做豬羊。

在閩錫山那裡，人民是農奴，是『死的工具』。閩錫山的政治，就是爲的去『拿起』這死的工具來爲他工作。

但是：閩錫山於人民究竟是但知道『拿起』使用，而一點『仁政』也沒有嗎？是的，他也有一些『仁政』，比如，閩錫山的『手諭』就有過以下的一些話：

『據報三十三軍補充營長張宜生，於陰曆二月初二日在駐地高家埕塚，經過村民鄭明星之門口時，被犬咬傷褲腿，該營長已將狗擊跑，怒猶未息，復進院內將犬主鄭某亂打亂罵，踢傷其小腹，並勒令將狗交出，綁棗樹上，用棍擊斃，村中人民大爲不滿等情。張營長此種行爲，真是太不聰明，太違反軍人的德性，也太吃虧了。此事正當處法，應本愛人以德之心，爲狗主設想，爲今後不再去設想，剴切勸告犬主，將犬管住，免嗣後再傷他人，滋惹事端，則犬主一定感激慚愧。此係『仁者安仁』之處法。不能如此

，亦應利用狗咬，表示寬宏大量，使聞者欽佩，藉狗咬的事實，做了要好的機會。這是「智者利仁」的處法。不能如仁智的處法，亦只可忍而不發，聽其咬人，日久自有人擒制，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鄭式公之諺智是也。」（『行動』九卷十一期）。

大家看！閻錫山的『仁政』竟把恩惠施到了狗身上去了。『可以人而不如犬』嗎？不過，閻錫山這套手法，不是他手下那些人能學的，大概只有閻錫山自己，或者加上其他一兩個『修養到家』的人，可以辦到。但是『仁者安仁』這一條，他也一定辦不到。假如閻錫山被狗咬了，他會取上『智者利仁』那一條，並在克難坡的報上登一條新聞，將來還要寫在他的傳裡，將這個『仁』充分地『利』用一下。至於那班營長之流，靠得住把『領袖』的『手諭』拋之腦後，一遇狗咬，總是拖出狗主，亂打一頓的。因為在閻錫山訓練下的那批特務頭兒們，對於人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怎能有什麼是真正的仁心仁政呢？

除此而外，是否還有其他什麼『仁政』呢？要我當然還可以找得出，例如：

『汾西區統委會主任姜客晉，爲安靖地方肅清敗類起見，曾於上年十一月二十日特

組織第十二區統委會，汾西及靈石組，政、軍、經、紀律糾查團各一。其作法如次：

一、目標：爲民愛民，主張公道，使人民安居樂業，人民得享安寧幸福。

二、途徑：除暴安良，維護地方治安。

三、方法：先斬後報，肅清地方壞人。

四、在行政上：（一）協助並完成當前工作。（二）保險並掃除工作障礙。……

剷除五抗：（1）抗戶不上；（2）抗差不支；（3）抗糧不納；（4）抗兵不當；

（5）抗款不出。』（『行動』九卷三期）

閻錫山對於這個報告批了三個大字：『登行動』。既然他批在他的官報『革命行動』上發表，當然是叫其他各地一體凜遵的。對於這裡所規定的東西，又應該倒讀上去的：行動是『剷除五抗』，方法是『先斬後報』。這就是閻錫山的『除暴安良』！這就是閻錫山的『爲民愛民』與『主張公道』！總而言之，這就是他的『仁政』！

但是，從有『五抗』的存在看來，究竟可以反證：閻錫山的『仁政』是如何一種仁政了。他這個農奴主法西斯主義的政權是否有『鞏固』或『開展』的希望，也就不難明

白了。

四 結 束

事實上，閻錫山自己也是會感到他那個農奴主法西斯主義並沒有什麼力量，並沒有什麼前途可言的，他是會感到他那些「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思想」和辦法之不可免沒落的悲哀的。所以，他只得求神庇佑了。且看這次新聞記者團關於閻氏住宅的描寫吧：

「三個竈洞中，中間一個是會客的，就是那洞口壁上，發現一個凹進去的神龕，裡面供奉着一張花花綠綠的紙條，上面印有「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之位」，神龕的外邊則貼着「天地交泰」和「天天須進步」的對聯。這大概是閻先生自己的手筆吧！」（重慶『新民報』六月二十四日）

「地地要劃分」，就是他那種極端反動的份地經濟、鑽村經濟的新農奴制度思想，這一節既開命矣。「天天須進步」呢？就是說，必須天天要想壓迫人民的新辦法。在閻錫山這種法西斯份子看來，壓迫人民愈兇就愈叫做「進步」了。但是找誰幫忙呢？雖然

『親日亦未嘗無益』，又有國內其他法西斯勢力可爲呼應，可是，在人民面前，聞錫山無疑的是孤單的很，於是『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就被請出來了。然而古書不云乎，『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這個『天地三界十方真靈主宰』爺爺立在雲端，張眼遙觀，不看猶可，一看可要氣破肚子。爲什麼呢？因爲我們這位幾世修下的『領袖』兼『會長』兼『長官』的哲學，是『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做鬥爭』的。而且『宣傳有時可以不作，鬥爭一天不可放鬆』。原來是一位撒謊大家，未免和『真靈主宰』爺爺的宗旨不合，叫他保佑，那是困難的。於是乎可以斷定神是不會保佑的了。那麼出路怎麼樣呢？

——如果他不敢底向人民悔罪的話——

——要知出路怎樣？

——請看墨索里尼！

（一九四四年八月稿）

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

五千言書

(一九四四年八月)

續 範 亭

謹陳者：範亭自西安事變後，做楊虎城的代表，回到自己的家鄉山西太原，向黨和山西人士，陳述了西安事變張楊之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主張；並且把我所知道的共產黨的主張：在世界聯合英美蘇共同打倒法西斯，在中國爭取蔣介石及各黨各派全面抗戰到底，也向你和山西人士陳述了。你當時沒有肯定的表示，但對釋蔣南返，你是表示懷疑的。那時我還是和你第一次的正式見面。我在兩年之間，奔走萬里，所到之處，盡是黑昏，愛國犯法，抗日有罪，媚日恐日成爲風氣。西安事變稍見光明，但短期間就被熄滅了。

山西以一隅之地，提出了守土抗戰，收羅進步青年，成立犧盟會，解放思想自由，允許開設生活書店。我看見山西是有了光明，雖然是僅僅點出一支土蠟燭來，光明不大

，但我却和許多愛國的青年一樣，像撲燈蛾似的，圍繞着這一點兒光明，不肯他去了。

『七七』抗戰開始，你高喚這是民族戰爭，需要大家一齊努力，委我爲高級參謀。我忠心耿耿的幫助你抗戰，是爲了我們的國家，不是爲了你個人。山西的動員羣衆團體，除犧盟會早已成立，八路軍開入山西後，就成立了各黨、各派、各軍參加的公開統一戰綫的戰地動委會，並推我爲主任委員。由戰委員又發展了暫一師新軍，由犧盟會又發展了山西的決死隊、工衛隊，政衛隊等。

由於山西的晉綏軍、八路軍、新軍及各友軍是真正合作，使侵入平型關、雁門關的敵寇受到很大的創傷。此時的山西，蓬蓬勃勃真是抗日的模範。此後太原、臨汾相繼失守，你率領餘部退守吉縣，更渡黃河，駐節秋林。當此時也，若不是八路軍、新軍、犧盟會、戰地動委會發動羣衆，保衛山西，建立了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北諸根據地，在敵後發展了廣大的游擊戰爭，山西的前途，早已不堪想像。此時正應該加強團結，開放民主，發動羣衆，謀與敵人作長期鬥爭，把山西作爲華北抗戰的堡壘。所有軍民，異口同聲，一致要向前這個目標前進。

誰想一九三九年初，你所召集的秋林會議，正是圖謀投降妥協，加緊獨裁，破壞團結，製造分裂，陰謀反共，困死八路軍，餓死八路軍，取消動委會，取締鐵盟會，先消滅決死隊，再消滅暫一師和工衛隊。這個秋林會議，是集反動之大成，投降叛國之開始實行。秋林會議的這些陰謀，雖未公開發表，但在你每天開會的言論和行動中，我們已經完全感覺到了。本來你的『守土抗戰』，就是告訴日本人：我的抗戰，就是爲了守護我的這塊地盤，只要你不侵犯我這塊地方，我不抗戰也是可以的。你在會議中提出了『無條件存在』的理論和『狡兔三窟』的政策。無條件存在，就是不擇手段的存在，你暗示了如果能存在，投降敵人也可以。『一切爲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這是你的高論。你對你的核心組織的同志會說過：『續範亭是捐上棺材抗戰的，我們不能捐上棺材抗戰。』至於『狡兔三窟』的政策，那是你自己『唯中論』、『唯我論』哲學的傳統。『唯中論』是以自己利益爲中心的。況且狡兔三窟的政策，你在抗戰以前就早做了準備工作，秘密派遣南桂馨、蘇體仁、薄以衆等常住天津，與日本人接洽搗鬼，這是你多年經營的第一個窟窿；其次就是向國民黨、共產黨經營的兩個窟窿，但是要費力經營的窟窿

，還是東面向着日本人的那一個，這都是我們當時深切知道的。

秋林會議以後，你就按着你的陰謀計劃進行，組織了『突擊隊』、『精建會』許多特務團體，散佈謠言，瓦解新軍，破壞新軍，打擊犧盟會，解散戰地動委會，對於八路軍，也是到處壓迫打擊，造謠中傷。一方面與日寇勾通，先改編你的一部分隊伍『抗日忠勇先鋒隊』，這個圖記，是我們由十九軍被俘的軍官手裡得來的，約有一寸寬、五寸長，我們現在還保存着。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你與日寇配合，以六十一軍和十九軍等幾個軍，突然向韓鈞等所領導的決死二縱隊包圍進攻，經過一個月的苦戰，韓部轉入晉西北。同時你又命令趙承綬、郭宗汾兩個軍，放棄岢嵐、寧武、五寨對敵陣地，撤至興縣、臨縣、方山之線，包圍決死四縱隊、暫一師和工衛旅。我們處在日寇和舊軍的夾擊之中，苦戰半月，趙、郭兩軍退守離南，把嵐縣也給敵人佔領了。

同時，你們又進攻晉東南戎伍勝、董天知領導的決死三縱隊，雖然你們殘殺了許多地方幹部，瓦解了三縱隊幾部分軍隊，但是也沒有佔到什麼便宜。這是新舊軍事變的大

概經過。

我今天還要追問你一句：爲什麼一定要消滅我們？我們的罪案究竟在那裡？在你未答覆以前，我先解釋一下，你看對不對。辛亥革命，你以同盟會面目，兩面手段，攫取了個都督，權力剛剛到手，就投降袁世凱，消滅異己，殘殺同志。晉南革命領袖李岐山，被你騙送到袁世凱的監獄裡；晉北的革命領袖續西峯，被你通緝捕拿，逃亡在外十餘年；當時山西的革命同志，被你殘殺下獄者不可勝計，逃亡者數百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這是民國三年的事。以後，你把六十幾歲的老父親送給袁世凱抵押，決意向袁世凱稱臣，袁世凱做了皇帝，封了你個什麼侯。袁世凱死後，你又繼續擁護馮國璋、段祺瑞、徐世昌、曹錕、吳佩孚等北洋軍閥餘孽，反對革命。

山西地位靠近北京，自民國開始以來，你總是擁護北洋系爲正統，反對革命，革命黨人實在把你討厭透了。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推倒曹、吳，我們的革命領袖胡竺僭、續西峯等主張的預定計劃，先打倒山西，再對付奉天，可惜我們的最高軍事長官馮總司令，還有一般高級將領，被勝利衝昏頭腦，認爲你是很恭順的，不足爲患，先打了奉軍李

景林，逃脫了山西，這是你的幸運。以後你出兵石家莊和大同，抄了國民黨的後路，幫助了張作霖和吳佩孚，與他們聯合，進攻南口、雁北，把國民黨趕到靠近沙漠的五原。你這對中國的革命，是何等不可赦的罪惡！十九年，閻馮變戰蔣介石，我是沒有勇氣參加任何一方面的，我認爲你們誰勝誰敗，都是不利於國家，不利於革命的。這是你過去的政治方向。

我聽說會有人勸過你說：『續西峯不但是山西的人材，而且是國家的人材，他在外頭進行革命，是與山西不利的，不如把他叫回來。』你說：『我知道續西峯是個千里馬，但我們不會騎馬，騎上就會掉下摔死的，所以非把他收拾了不可』。但今天的續範亭，並不是千里馬，是三十年來革命戰線上一匹孱馬、病馬，一天走不了幾十里地，進步很慢；但你基本上害怕馬，剛剛騎上一開步，你自己就掉下來了，何況薄一波、韓鈞等都是些駿馬，都是中國的千里馬，你更不敢騎了。但是不會騎馬，不敢騎馬，就要反回頭來打馬、殺馬。馬是有知覺的，他感覺到疼痛，爲了自衛，回敬你一脚就跑了，離開了你，這就叫『閻王定下殺馬計，跑了馬兒又傷身』，這是何等愚蠢的事！或者你給

我們加一個罪名是：與八路軍合作抗戰，同情共產黨，擁護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違犯軍法、軍令，敵後亂打游擊。但我們估計這不是我們的罪案，而是我們對國家民族應該盡的責任。與八路軍合作抗戰到底，這是中國團結抗戰天經地義應作的事。信仰新民主主義，擁護抗日民主政權，這是我們甘心情願的。孫中山先生提倡革命，至今五十餘年，中國革命的志士和中國的勞苦人民，流血犧牲何止億萬。然而三十年來，軍閥橫行，民主政權迄未建立，三民主義毫未實行。八路軍共產黨在敵後建立了民主政權，實行了三民主義，發動了八千餘萬廣大羣衆，予日寇以長期的致命打擊，建立了中華民國復興的基礎，使國家免於危亡的慘禍，使投降妥協的獨裁者們有所顧忌，不敢明目張胆的投降敵人。八路軍共產黨對國家的這種功績，我們不但同情，而且擁護；不但擁護，而且感激流涕，願意和他們永久站在一塊，而爲國家民族奮鬥到底。你說這是我們的罪案嗎？就請你這樣宣佈了吧，我們是願意接受的。現在你和敵人勾結起來打我們、打八路軍，你已經成了國家的叛軍，那我們當然是叛軍的叛軍了。這個叛軍的罪名，我們倒也是願意承受的。

我再奉勸你幾句話吧！你已經六十多歲的人了，就是勾通日寇，回到太原，你還能享受幾天？正如趙主席警勸你的話：『那種下流漢奸滋味，你能受得了嗎？』就算不能忍受得了，你的部下都能忍受得了嗎？你和你少數的高級將領官僚們，所以不顧一切，毫無廉恥的想着急於回到太原，無非是想着舊夢重溫，享受你們的朱紅大門、黑漆大門、中西合璧、書棟彫鏤、嬌妻美妾、燕窩魚翅、現洋股票、汽車馬車，過你們那作威作福富麗堂皇的日子。但事實已經大大變遷了，朱漆大門已經重染了太原人民之鮮血，燕窩魚翅也不容易找到，嬌妻美妾日本人還要揩油，現洋股票也不容易重回你們的手，作威作福已經是當了日本人的孫子，比奴才的奴才還要下賤。現在日本人就要失敗了，人民絕不能讓漢奸長期的存在，到時候落一個人財兩空，走頭無路，你就不爲你自己着想，跟你多年的部下，還有多少熱血的青年，你忍心把他們葬送到黑淵裡去嗎？實在說，你的部下也不一定都贊成你的作法，他們不過爲軍法軍令所迫，不敢不服從你罷了。

在晉西北的時候，我和趙承綬講了些只有抗戰到底才有出路、動搖就是罪惡的大道

理，他說：「範亭，你說得很對，一切罪惡都是由私人財產所累，但是閥長官有任何命令，我們還得服從，我們是脫離不了山西這個小圈子的。」但這是你們貴族階級的觀點，其餘山西人民，以至梁化之領導的一般青年，都是反對投敵妥協的。要說你的部下，都願意跟你投敵，恐怕是極少數吧！你知道『誤人子弟，男盜女娼』強迫人做漢奸，這是何等的罪惡！自你統治山西三十餘年來，試問你的成績究竟在那裡呢！不過是太原市上增加了許多奢侈無恥生活的寄生蟲，朱紅大門幾十家，黑漆大門幾百家，搜刮山西人民的血汗，剋扣山西士兵的軍餉，做你們少數人的資本，不管重工業也罷，輕工業也罷，都是你們少數人分贖發財的工廠和公司。你們的財產多少，我都沒有調查過，南桂馨的房子幾乎佔了幾條街；周岱的陪嫁女兒嫁裝數百拾，擺了幾里長；李服膺一夜輸了現金十三萬；太原市上無一公團，蔡渾茹個人花園經營費十餘萬；至於你的財產，更不用講了。

你兒子的汽車，在太原市上，橫衝直撞，絕不避路，太原的司機師都在頭痛，今天在延安的司機師，談起來猶有餘恨。

一九三八年，趙承綬的老婆會傷心的向我說：『五台的老家裡存的三百床嶄新的被

竊；給日本人搶光了；價值一千多元的洋狗，也給日本人打死了；埋藏在地下的銀錢財物，還不知有也沒有？』趙承綬也告訴我說：『我們家產是完了，北平的也沒有了，大同的也沒有了，綏遠、太原、五台的家都沒有了，現在只留下現洋六十萬元，儉省一點可以過幾年。』這是我所知道的幾件事，隨便舉出來說一說。無窮的奢侈，多方面佔有，其餘都可以類推的。

這些情形，你大部份都是知道的，但你以為是當然的、合法的，因為你們是當權的貴族，真是『貴人一勞心，價值千萬金』，這就是你的按勞『分配』吧！

山西一般人民的生活，却又怎麼樣呢？到處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把持地方政權，壓迫人民，剝削人民，以致農村破產，窮困萬分，我的村子素稱富饒，而三百餘戶中，不向人借債的，只有十餘戶。甚至村長、保長有驅逐住戶出村之權，這就是你的『模範村政』吧！

三十年來，所有你親近的官僚、軍官，決心做你的奴才走狗的，都是大發其財，並且他們的地位、官級，差不多成了固定的，造成山西一種貴族階級，這是你們想着投降

敵人，重溫舊夢的總根源。至於你個人的財產，當然也是『狡兔三窟』，別人不容易知道的。抗戰以前，發覺了的只是法國銀行騙了你四百萬。臨汾開會時，你告我說：『山西省政府的財產尚有兩萬萬，都要拿出來抗了戰。』我是很贊成的。但山西的財產在你一手把持之下，你認爲是私的，自然是你們自己的，公款、公產的所有權，也在你的手裡。私的自是私的，公的也是私的，究竟你把這些財產是不是抗戰用了，我也不知道。總而言之，你是山西一切獨佔與支配者，今天又要領導部下與人民，投降敵人作漢奸，你的權利究竟有多麼大？

你們陰謀投降敵人的辦法，花樣很多。一九四二年，你得到敵人的允許，你把你的學校、工廠以及一切器材，都搬至河東吉縣一帶，與敵人和平共居，並且與敵人進行了『安平會議』。向重慶要脅，增加了許多軍費。向延安八路軍、新軍示威，表示你有了奧援，日本人爲你撐腰。這種政策，無以名之，名之曰『耍死狗政策』。這和鄉下的無賴一樣，勾結土匪，威嚇鄉里，詐取錢財，洋洋得意，這是何等的醜事！而你自以爲是一舉數得，此計甚妙，不聞國人之唾罵，把你早當作死狗一條了。同時，你還實行『策

偽政策」，這種「策僞政策」，有兩方面的作法：一方面和日寇講好，把你們的文武幹部秘密的分配在偽軍、偽政權中，一方面替日寇做事，共同反共，打八路军和新軍，破壞抗日民主根據地，到了日本人顧不來的時候，你們把他們收回來，人地兩得，都成你們的了；另一個辦法，是你們的軍隊秘密的讓他叛變了，變成偽軍，佔領地盤，搜刮人民，配合日寇進攻八路军、新軍，破壞抗日民主根據地，日寇顧不來的時候，再交還你們，豈不又是一個人地兩得嗎？這種政策，實在是卑鄙無恥到極點了！國民黨數十將領投敵，而不加以通緝討伐，都是這種政策的陰謀。這種政策，人們把他叫做『借屍還魂』的政策，就是借偽軍的屍體，還回你們的地盤與權力。其實這種政策是愚蠢的，大凡做了偽軍，當了漢奸，人民已宣告了他的死刑，他已經沒有魂靈了，怎麼還能還回你的靈魂來呢？此計雖陰險，但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辦法。最後，就是你的直接投日，但這個辦法更是危險，我把這個政策叫做『下陰取魂』，就是你親自到陰曹地府，想着把你的靈魂取回來。這是一去不返的辦法，你看世界上已經死了的人，能回來的有幾個呢？

你是一個獨當一面的司令長官，應該有這麼一種胸襟：人之父母就是我自己的父母

，人之兄妹就是我自己的兄妹，日寇自侵入中國以後，把我們的同胞們、小姑娘、老太太姦淫殘殺了不知多少，應該提倡每個人有百分之百的仇恨心，不報此仇，不是人類。而你們恰要妥協投降，那就等於日寇在面前，把我們的媽入死了，而你們還在後面舐日寇的屁股，這在任何方面說來，都是何等王八無恥的事！

一九三九年，你們和日寇搗鬼、謀害新軍的時候，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有幾句話是：『只要你們抗戰到底，我們叫你們爺爺都可以，但是請你們別搗鬼。』這些話還不够下情嗎？這都是爲了我們的國家，並不是怕你們。現在你們真要給日本人當孫子了，那我們就不能再下情了，因爲這樣做下去，我們就低了四五輩，把祖先成了日寇，太吃虧了，再不能向你們求情了。但是，你們投降日人以後的地位呢？或許還會把王克敏叫伯伯，把汪精衛叫叔叔，那就成了奴才的奴才，孫子的孫子了，這是何等可恥的事！按你的行動，實在是中國的米海洛維區，現在米海洛維區被南國的舊政府撤職了，並給以國家反叛的處分。國人自有公論，政府當有權衡，就以現在的通敵事實（詳見薄一波、韓鈞向記者談話），已經是死有餘辜了。

我這一封信，雖然是批評你、罵你，但是很公正，很確實的。三國時，諸葛亮罵死王朗，我今天並不是想把你罵死。我也不是諸葛亮，當然罵不死你，因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還講些廢話，得了罵以後，就羞愧而死，你是個自私自利、不顧一切、陰險奸詐、頑鈍無恥成了精的老怪物，當然把你罵不死的。但還希望在利害的關頭上，把你罵活了，因為你又是一個最聰明的人，純講利害的。中國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日本打出去，一定要走向民主的道路，山西無論如何艱難，也一定要把日本打出去，也一定要走向民主的道路，這次應該了解吧！

你是山西的土皇帝，一切言論和行爲，都有些人拍你的馬屁，實際上你的『唯中論』、『物產証券』、『按勞分配』等『學說』，都是投機取巧、壓榨人民的『理論』，不值識者一笑。你多年在山西好像井底之蛙，小地小天，自高自大，而你自以爲你的學說是超過馬克思和孫中山的，所以你既反對共產主義，同時又背叛三民主義，你真是天下第一了！

在秋林會議時，你常向我們誇耀的說你的『唯中論』哲學是再妙不能了，如八月十

五中天之月，不多一點不少一點，又中又正，又滿又圓，但我們感覺到你的爲人恰與此相反，你如『廁中怪石，不中不正，又臭又頑』，這和『井底青蛙，小地小天，自高自大』作爲一聯，不就是你的全體面貌嗎？古人說『人苦不自知』，自古以來，你們獨裁居高位者，被人恭維，被人包圍，永遠不會了解自己、認識自己的，這倒難怪你一人。反過來說，這就是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貴，所以必須也。您還以爲我們反對獨裁、主張民主是攻擊個人嗎？任何國家的獨裁制度，都是在現今世界不能立足的了，您明白嗎？

三十年來，在中國軍閥混戰的時期，就是誰會投機取巧，搗鬼搗的好，誰就能佔一時期的勝利，多存在幾年。你是一個投機取巧、搗鬼搗的最好的，因此你存在到現在。但是今天的民族革命戰爭是正義戰爭，就是誰投機取巧誰倒霉，誰最善於搗鬼誰失敗得最快，因爲戰爭的性質不同了。您雖聰明，沒有了解了這一點，仍然繼續您的投機政策、搗鬼政策，所以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禍由自取，怨得誰來？

我雖不是共產黨員，但我十分同情並擁護共產黨的辦法，因爲他們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我所以反對你，是因爲你背叛了三民主義，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結日寇、背叛

國家，壓迫山西的人民。我實在告訴你說吧，我這個人，是毫無私人恩怨的，誰對得起國家民族，我就擁護誰，誰對不起國家民族，我就反對誰。十年前，我還是個頗爲學佛的人，四書五經、諸子百家，我也多少讀了些，認爲世界任何的壞人，都能感化而轉變的，我的陵園自殺和又回到山西做事，都是想拿我區區的個人，影響你們。我現在才知道，我這個觀念是錯了，不但收效甚微，而且自苦太過。陵園自殺，流了我的滿腔熱血，並且每遇到可悲可憤的事情，我就又要流淚，又要吐血，我的悲傷憤怒，真有天來大。我給你這一封書，還是在病床上口述的，並且又流了我的多少淚，吐了我的多少血。但我的淚是與世界上被壓迫人民、中國被壓迫人民和山西被壓迫人民同傷之淚；我的血是與世界被壓迫人民、中國被壓迫人民和山西被壓迫人民共流之血。你們的特務們，尤其是榆林的特務們，常常向西安和山西報告，說『積範亭已經死了，千真萬確的已經死了』兩三次了，這大概是你們那些小狗子們，一方面向你們報功，一方面和我仇視你們這一類的人一樣，不願意教世界上再有一個人存在。但是我實在告訴你吧，我現在還活着，並且我還了解些馬列主義，而且聽到毛主席的許多高論，他解救了我不少的憂悶與

煩惱。他說，世界人類的慘劇，都是由於不良的制度產生的。中國尚在半封建的階段，所有一切人民的痛苦，比歐美國家還要殘酷，中國必須建立真正民主制度，才能走上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道。人類社會制度之向前發展是必然的，不是少數人的意願所能做成的。我聽到了這些高論，知道我們這些害國害民、倒行逆施的東西必然要崩潰，是無可倖免的，使我輕鬆了許多。我的死也許三月五月，也許一年半載，但也許死在死的後面，因為誰也沒有開真正的人壽保險公司。但我和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軍閥一同死掉，和索一同死掉，和那些勢利小子、賣國賊一同死掉，我是甘心情願的，並且是很舒服的。嗚呼！「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大概是被壓迫人民對獨裁統治者的共同心理吧？

只要你們不投敵、不反共，抗戰到底，贊成民主，將來山西全省民主政府成立了，當然每個國民都有他的一份。那時你們在民主政權之內，也都是抗日有功的人，當然更加優待，享受你們的人權、民權、財權、地權各種應有的自由權利，豈不勝於投敵求生而死！誰利誰害，請詳思之。愚直之言，尚請俯察其情，勿以詞而害意。揣此進言，並請籌安！

續範亭 八月十九日

薄一波同志駁斥閻錫山荒謬宣傳

(一九四四年八月)

新華社延安八月十三日電：本社記者以河南失陷，湖南戰局愈益緊急之時，閻錫山氏命令所部六十二軍，繼續配合敵寇進攻，決死隊八路軍，（詳情見本書附錄一——編者）並對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發表荒謬談話，誣蔑八路軍決死隊，經過著名的漢奸通信社（盟利社）在西安報紙上發表等事，特走訪不久以前自前方來延之薄一波同志。薄一波同志現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兼太岳縱隊政治委員，為山西新軍（決死隊）及犧盟會之創始人與主要領導人之一，對山西內幕知之甚悉。

記者首先問他對西安西京日報（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所登載的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的談話有何感想？薄一波同志憤慨地說：『這種談話，不僅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對八路軍、共產黨、犧盟會、決死隊造謠誣蔑的一套爛調，而且是掩蓋他勾通敵寇破壞抗戰等叛國罪行的一種煙幕。閻錫山的通敵叛國行為，我是很早就知道的，因仍希

望其悔悟，繼續團結抗戰，並保存他的名譽，從未公佈過，不料他時至今日，竟毫無改弦更張之意，甚且變本加厲，殊覺惋惜。」接着，薄一波同志暢談閻錫山數年以來通敵反共的經過如下：

太原失陷以後，閻錫山所部舊軍土崩瓦解，無數官吏棄職逃跑，他深深感到三十年經營的『家產』一旦盡失，而能支持抗戰的又爲自己所不喜歡的共產黨、犧盟會、八路軍和決死隊，於是對抗戰前途悲觀動搖起來，發出『不能抬上棺材抗戰』的謬論。

一九三八年二月，閻錫山曾在臨汾溫泉召開晉綏軍高級幹部會議，在一次機密會議上，他拿出徐永昌從武漢打給他的電報，內容是當時德國陶德曼建議，（漏十餘字）相見，與會者面面相覷，默不作聲，閻說：『這些條件並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會亡國滅種。』當時我起立發言，聲明犧盟會和決死隊一定要抗戰到底，一定要反對和平妥協到底。閻沈默良久，說：『看蔣先生吧！中日戰爭總有和平了結之一日，我們以後不應該說反對和平妥協。』此會議不歡而散。這時閻錫山的舊軍隊已潰不成軍，政府官吏則狼狽不堪，就靠八路军、新軍和共產黨、犧盟會支持山西的抗戰局面，所以還不敢

有如何的反動動作。

臨汾失陷後，閻錫山搬到晉西吉縣開辦校尉級軍官訓練團，挖空心思，製造了這樣一套投降理論：『蔣先生腦筋中早已想好妥協的問題了，因之他可以設法更多增加前綫的困難，使前綫將領均自動要求停戰，他可以任意廣播共產黨、八路軍破壞統一、不服從命令，加他們一個『奸黨』、『奸軍』的帽子，在不知不覺之中轉移抗戰爲剿共，一切關鍵，只在日本條件能否接受，這種情勢，我們要看得很清楚，天要下雨，要趕快備雨傘，一落人後，就要吃大虧。』他又對他的軍官們講：『抗戰以來，晉綏軍抗光了，唯獨八路軍不但不減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犧盟會、決死隊和共產黨八路軍合作，今後還有我們晉綏軍立足之地嗎？』

一九三九年，閻錫山已決定通敵反共，在做過種種反人民、反新軍、反犧盟的準備步驟之後，十一月一日，令十九軍軍長兼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六十一軍軍長兼六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各派代表一人，與敵會清水師團長試行和平談判。十九軍派的是梁培璜，六十一軍派的是呂瑞英，到臨汾劉村找到蘇體仁（僞山西省長）的代表蘇靜仁（

偽省府第一科科長）後，轉介紹信與清水師團長的山下參謀談判，條件如下：第一、晉綏軍改編爲『中國抗日忠勇先鋒隊』，實行反共，日軍須將隰縣、午城、蒲縣、千香鎮等據點撤退，將來並將汾陽一帶地區讓與晉綏軍駐紮。第二、日軍須幫助晉綏軍剿除在山西的八路軍、決死隊。第三、日軍須接濟晉綏軍槍械、彈藥。第四、山西各將領之住宅、財產，日軍須完全歸還。這就是哄傳一時的『臨汾會議』。此會議後，閻錫山就發動了是年十二月晉西事變，集中六個軍的兵力，與敵人配合，企圖一舉而先消滅當時駐於晉西南的決死二縱隊，然後再逐漸消滅決死隊其他縱隊。從此，閻錫山便在晉西南與敵人和平共居，儼如一家人。

閻錫山既已從晉西南及中條山地區驅逐了決死隊、鐵盟會，便爲所欲爲起來。一九四一年三月間，派其五妹丈梁延武（在日本留學數年，爲日軍××多年之日本特務）赴太原訪板垣征四郎，梁住在太原新民街敵特務機關內，同去者有閻之機要處副處長劉迪吉，帶有電台兩座，及機要工作人員等四人，住太原小北門國師里門牌七號與四號。劉現仍爲閻之機要處副處長。四月間，閻又派其騎兵軍軍長兼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綏赴太

原，由蘇體仁介紹，與敵商定下列各項：山西各將領之住宅，可由趙承綬向敵軍收回；敵在中條山發動戰事打勝後，閻錫山即可向太原前進。自此以後，梁延武、劉迪吉、趙承綬不斷往返於太原、北平、南京、興集間。除梁延武爲閻錫山住太原之政治代表，又增派王乾元（曾任閻之師長）爲住太原之軍事代表，這在二戰區，當時是公開的秘密。一九四二年一月間，得到敵人允許，閻錫山將其洛川、宜川的後方，大部渡河搬至吉縣、大寧一帶，互不侵犯，從此就鬧的更不像話。敵人則準備將閻錫山抬爲華北『見皇帝』，閻錫山本人會親自於四月二十二日至安平村與敵方代表山下參謀及漢奸代表李哲齋等開會，同時參見者有汪逆精衛之代表梁西嶠（梁係山西崞縣人，閻錫山多年培養之老漢奸，又是梁延武之叔父，經常住在南京），談判妥協條件，敵方所提條件爲：（一）閻須脫離重慶政府，態度明朗化。（二）閻讓出小船窩渡口給敵人佔領。（三）共同反共。（四）閻錫山返太原主持華北大計。閻方所提條件爲：一、日方供給晉綏軍小麥雜糧二百萬袋。二、補充晉綏軍輕機槍二千挺，重機槍五百挺，步槍十萬支。三、二戰區護照在敵佔區有效行使。談判結果，閻錫山表示不願立即返太原，敵方代表對閻所提條件

亦未作具體答覆。會畢，閻並與山下合拍一照，以留『紀念』。但事實上，敵人所提出的第三條，即共同反共，閻完全照辦。閻錫山所提條件的一部，敵方亦逐漸見諸實行。爲了運糧、運布、運械，閻錫山曾修通隰縣至大麥郊、至汾陽之公路，以及孝義至靈石之大路，此爲人所共睹的事實。這就是二戰區盡人皆知的『安平會議』，敵人把這個協定叫做『現地協定』。

安平會議之後，二戰區各界輿論大譁，許多人願不願妥協投降，不久即有民大學生七百餘人舉行武裝起義，抗議閻之叛國投敵，被十九軍包圍繳械，民大負責人智力展被捕監禁。但群眾憤激之情，並未因此而壓抑下去，反抗運動仍在暗中熾烈進行。趙戴文與梁化之二氏，皆閻之親信，亦認爲閻氏此舉『太危險』，於是年四月三十日晚同往見閻，詢問妥協真像。閻良久不語，梁說：『一般公務人員和青年，決不妥協。』趙意仍要和敵人打，說：『今日一打生效，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不然回太原當下流漢奸受氣，你如何吃得下？』閻因民大起義，左右又有人反對，遂又動搖。爲掩飾這一幕醜劇，遂於次日朝會上講話：『過去爲求達到革命之目的，不惜千方百計以謀

保全，現在革命已到最後關頭，非犧牲決無幸免之道。」並宣佈智力展准子「戴罪圖功，免予處分」，企圖以此和緩衆憤。自此，閻錫山的投降活動，又從公開轉入秘密了。

閻錫山在抗戰開始時就是不堅決的，他的哲學，是一切事情都不能作得太絕對了，抗日要準備聯日，擁蔣要準備反蔣，聯共又要準備剿共，他把這叫做『中的哲學』、『唯中哲學』，其實是兩面三刃的投機份子的騎牆哲學。根據這種『哲學』，抗戰初起時，他就任平津留下了一個班子，主角是南桂馨（閻錫山之盟兄弟）、蘇體仁、薄以衆（閻錫山之妹丈）、高雲階等，敵人一來立即投敵，準備着和他唱『雙簧』。這個班子，現在都是山西的漢奸頭子，同時又都是閻錫山的人。閻錫山和邱仰溶都透露過這樣的消息，山西的維持會長、偽省長等都是由這個班子推薦的。閻錫山從興集派去與敵人接頭的代表，總望先跟蘇體仁這批漢奸取得聯系。

閻錫山對公開投敵回太原做華北的『兒皇帝』，雖然有很多的顧慮，但仍有莫大的興趣。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他又派代表靳祥雲（留日學生，山西陵川人，著名的老漢奸），梁延武，曲憲甫（五台河邊村人，閻之表侄）等，與敵在太原作如下秘密協定：

一、敵寇將沁源、安澤、屯留、長子、襄垣、黎城、長治、浮山、翼城、沁水、陽城、晉城、曲沃等十三縣（這十三縣大部地區爲八路軍、決死隊堅持的抗日根據地）讓晉綏軍接管。二、偽政權中，偽地方武裝中，閻錫山可派人充任要職（第一批派去者有李暢生等，李已任偽五台縣長，靳祥雲任偽太原衛生局長等；第二批爲其旅長張翼率領之大批軍事幹部到太原）。三、閻可動員敵佔區他的舊日有關人員到二戰區受短期訓練，訓練後，再交靳祥雲轉介紹於敵人，担任敵偽各種工作。四、各交通要道和重要據點由敵人負責，共產黨區域由閻錫山負責。五、對共產黨剿清後之地區，由閻接管之。這一秘密通敵反共協定，已由今年一月以來逐漸實現。閻錫山所部之六十一軍和十九軍之一部，已背靠同蒲綏敵軍，進駐臨汾、浮山、洪洞一帶，奉日寇之命，進行『剿共』、『收復失地』工作，其詳情已見八月十一日解放日報。

薄一波同志最後以極沉痛的語調語記者：

一九三六年十月間，閻錫山派人到北平邀我回山西工作時，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下，我曾提出三個條件：第一，不反對共產黨；第二，不反對共產主義；第三，開放

群眾運動，與共產黨共同進行抗日救亡工作。閻錫山表示完全同意，當時在場的趙戴文，梁化之也都很贊同。不意七年以來，閻錫山背信棄義，食言而肥，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倒退代進步，尊日寇爲太上皇，無時不準備做華北的『兒皇帝』，這究竟是誰背叛了自己的諾言，背叛了國家民族，背叛了人民？究竟是誰『寧願在我們身上放十槍，不願對敵人打一槍？』很顯然的，這恰恰是閻錫山自己，而不是新軍，更不是共產黨八路军。

我今日所談者，只是閻錫山七年來勾結日寇破壞抗戰，進行反共反新軍內戰許多事實中之一小部份而已。這些事，新軍總指揮續範亭先生及山西公正人士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過去每遇危急時期，我們總是一再勸告閻氏顧全民族國家，顧全他自己的歷史名譽，懸崖勒馬，勿爲親痛仇快，而閻氏却總是執迷不悟，每欲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殊屬倒行逆施，反動已極！當此盟國勝利在望，大勢已定之際，賣國投降絕無出路，其必至身敗名裂遺臭萬年無疑。語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閻氏共三思三思！

新軍二縱隊負責人韓鈞同志談

晉西事變真象

(一九四四年八月)

新華社延安八月十六日電：西安西京日報所載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談話中，有閻錫山在一九三九年準備冬季攻勢時新軍二縱隊負責人韓鈞率部叛變等說，本社記者爲使國人了解此親痛仇快事件的真象，特訪問當時親歷艱危的韓鈞同志。韓鈞同志首告記者：晉西事變慘毒真象，過去因爲希望閻氏覺悟一直隱忍下來，從未發表過。此次閻錫山顛倒是非，公然向中外人民淆亂真象，實令人不能再保守緘默。韓鈞同志隨將事變經過情形，詳述如下：

太原淪陷後，閻錫山即開始動搖，準備投降妥協。汪精衛投敵後，閻錫山又召開高級幹部會議，試探和平，他說：「抗戰與和平是個政治問題，不能說主張抗戰就對，主張和平就不對。」當時薄一波同志說：「敵人打進我們的國內來，要求民族獨立，只有

抗戰到底；和平妥協，就是投降，就是漢奸。」閻默然。閻錫山此種論調，談過不止一次，均爲犧盟、新軍所揭穿，所反對。但閻錫山投降準備，始終未停止過。犧盟、新軍主張，爲了爭取抗戰勝利，只有實行民主，發動群眾。閻錫山反對實行民主，取消民選縣長、區長、村長及各縣民意機關，他說：「政權是刀把子，拿到我們手裡，可以統治人，拿到人民手裡，就會危害我們，所以不能實行民主。」他又反對成立農民抗日救國會、自衛軍等（然而這是中國抗戰力量的基礎），他說：「農民是個老虎，發動起來是個亂子（怕他們抗戰到底，不聽指揮）；不發動是個空子（又怕共產黨來發動）。現在不是發動不發動的問題，而是掌握電鞭的問題（電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反對民主，反對發動群眾，都是爲投降妥協着想。他又說：「生存就是一切，抗戰只是手段。」「七七」事變時，爲了生存，他需要抗幾天戰，以後感到抗戰是長期的、困難的，就想投降，這也是爲了生存，正義公理，國家民族觀念，在他的字典裡頭是沒有的。他在作這些準備的時候，表面上裝作抗戰的樣子，而暗中早已在通敵反共了。與敵開過劉村會議、安平會議，通敵使節不絕於興集、太原道上，決死隊的負責同志曾經一再表

示：『我們來與你合作，是爲了抗戰到底，並不是爲了投降妥協。任何人要投降妥協，我們就要反對。』閻錫山因此視新軍爲投降妥協之最大障礙，用說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決死隊屈服，乃大施其『錦囊妙計』，於『不知不覺』之中『轉移』新軍爲『叛軍』，實行『討伐』。晉西事變的真正內容，就是如此。

卽就晉西事件本身而論，也是閻錫山首先背信棄義，發動內戰。閻錫山企圖解決新軍，蓄謀已久，至一九三九年十月間，乃授權王靖國、陳長捷等，準備進攻新軍；並找反共將領，一個一個地向他們說：共產黨、八路軍勢力日益壯大，再加上犧盟會、決死隊與之合作，我晉綏軍將無立足之地，現在我們只有解決新軍、犧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攜辦法，達到生存之目的。有一個反動軍官（劉武銘）問，如何解決？王陳答以先改組決死四縱隊爲『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再集中晉西六個軍，配合日寇，解決決死二縱隊，然後協同日軍，解決一、三縱隊。果然不久，閻錫山卽委任陳長捷爲『討叛』軍總司令。陳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卽晉西事變前第九天）發出密令，分三路向新軍進攻，計南路縱隊爲六十一軍，八十三軍及警備軍之第七十三師等，司令由自兼

，進攻隰縣屬之義泉、黃土（決死二縱隊司令部所在地）；北路縱隊司令爲梁培璜，率十九軍及三十三軍之一部，進攻隰縣、孝義邊之水頭、側口、大麥郊一帶（當時八路軍晉西支隊所在地）；右路縱隊爲新三旅等，司令崔道修，進攻隰縣之泉子坪一帶。同時，敵人亦集中臨汾至平遙間駐防之敵五千餘人於韓信嶺一帶。於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閻錫山下令決死二縱隊要準於五日向同蒲綫大舉破擊，實行所謂『冬季攻勢』。我正在動員部隊，執行破擊命令時，閻軍與日軍同時開始向我進攻。我們二縱隊處於日閻兩軍包圍夾擊之中，情勢至爲險惡，有全部被殲危險，不實行自衛，就要死亡。我只得一面對敵進行血戰，一面又被追不得不進行自衛，以抵抗舊軍。苦戰兼旬，始突破日寇和舊軍包圍，轉入晉西北，此即所謂『決死隊之叛變』。從此以後，決死隊就被稱爲『叛軍』了。

究竟誰是叛軍呢？是誰勾通敵寇、反對人民、破壞抗戰、背叛民族？是新軍呢？還是閻錫山？新軍既未反對人民、視人民爲猛虎，亦未參加過通敵叛國的臨汾會議、安平會議，亦未派趙承綬、梁延武、王乾元或其他任何人到太原、北平、南京晉謁敵人和汪

避精衛，亦未與敵訂立『現地協定』。而做這些事情的，恰恰是閻錫山自己。問題非常明白，即閻錫山自己也知道，決死隊並非叛軍。一九三九年以前，他對決死隊備加讚揚，說是革命青年，一切辦法都是革命的，自愧他的舊軍都是昏聩、糊塗、落後、不進步，不能向決死隊看齊。這且不用說，即在晉西事變以後，他也曾在他的『忠實同志』少數人的圈子內說過：『決死隊是革命的，抗戰最堅決的』；『薄一波不是軍人，但他們練下的軍隊，能與敵人打，這就是因為他們的辦法是革命的、進步的。』然而他爲什麼還說決死隊爲叛軍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在藉此以掩飾他自己通敵、反人民、反共的醜事，和漢奸或準漢奸的原形，並不是什麼『韓鈞叛變』或『新軍舊軍衝突』，而是投降與反投降的鬥爭，分裂與團結及進步與倒退的鬥爭。事實勝於雄辯，閻錫山縱有百口，亦難狡辯。

對這件事，不獨薄一波、韓鈞及其他在決死隊、犧盟會工作的共產黨人與非共產黨人，能够以我們的親身經驗去證明，還有國民黨老前輩績範亭先生（他是閻氏任命的暫一師師長，後爲新軍總指揮），也能以親身經驗作證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們能够將閻氏罪惡如數家珍地告訴人們的。

附錄

(一)

閻錫山部六十一軍進攻決死隊

八路軍

(一九四四年八月)

(新華社太行八月十三日電)汾東地區(即汾河以東，其中包括浮山、翼城、襄陵、臨汾、曲沃、洪洞、安澤等縣)，自一九四一年中條山戰役中央軍潰敗退走後，陷於敵手，當時我決死隊和八路軍一部，為援助友軍作戰，星夜趕赴太岳南部，始得拖住敵寇鋒銳，掩護友軍殘部安全西渡，並進而粉碎敵寇向同蒲路東側伸張的企圖，從敵偽漢奸統治蹂躪下，光復了汾東廣大地區，汾東人民，得以重見天日。三年以來，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所部六十一軍，雖曾一度勾結敵人，向我挑釁磨擦，但我汾東各階層人民，始終團結不懈，閻氏陰謀未逞。汾東人民在中共領導之下，建立起了三三制的民主

政權，組織與武裝了廣大人民，實行了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政策，各階層的團結空前增強，人民生活日趨改善；迄今汾東已完全成爲一塊鞏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南可威脅中條山敵寇，西可腰截同蒲綫，北則破擊臨屯公路，成爲晉南日寇的眼中釘。

不幸今年（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閻氏與日寇協商妥當之後，突然命令六十一軍從該軍駐紮數年之汾西地區，向我汾東地區大舉進攻，並聲言『討叛』（指決死隊）、『討奸』（指八路軍），『收復失地』（指從抗日軍手中替敵人收復失地）。我爲顧全大局，避免內戰，一面用書信經過地方士紳，向該軍懇切規勸，一面忍讓撤退，冀其悔悟，六個月來，始終未將該軍勾結敵人殘害人民的滔天罪行公佈於世，所以然者，深望閻氏及該軍或能回心轉意，以免親痛仇快。無如我雖再三痛切規勸，步步退讓，而該軍高級將領仍然執迷不悟，勾結敵人荼毒同胞之罪行，反變本加厲。爲使國人明瞭事件真相起見，茲將經過發表如次：

本年一月，住在翼城日寇附近的六十一軍汾東辦事處，即放出謠言，聲稱『六十一軍收復失地來了』，『凡與「奸」「匪」勾結的人員，都將殺得鷄犬不留』，藉以威脅

羣衆，造成恐慌情緒。

一月中旬，臨汾敵僞三百餘人，開始向浮、翼、襄、臨交界之塔兒山地區『掃蕩』，反復『清剿』一星期，將與我軍密切合作之友軍張國棟部包圍繳械。二十八日，翼、浮敵人又放出『增加二十輛汽車剿塔兒山』之謠言，企圖威脅我軍主力退出塔兒山，替六十一軍廓清道路。

當時我軍對上述謠言，並未介意，不料竟於一月二十八日，由第二戰區總參贊楊澄源及六十一軍軍長梁培瓚親率所部第四十八師、第六十九師、第七十二師及五區專署保五團、保九團與全部縣區村政權人員，經過敵人指定之史村橋、襄陵橋（均係敵人據點），渡過汾河，向我大舉進犯；所到之處，搜捕抗日人員，摧殘我區村政權及抗日民兵，大肆搶糧、抓丁，構築工事，聲勢洶洶。當時我軍因顧全團結抗戰大局，不願箕豆相煎，使日寇漁人得利，遂未還擊。經過士紳民衆給該軍送信，勸其制止進攻；同時我軍讓出塔兒山、二峯山至四孔山以東一帶長達百餘里之陣地，以求避免衝突。

閩部六十一軍進入浮南以後，其主力即駐於浮山城、天境地、梁家河、東峯頂等四

個敵人據點之間，其軍部則駐於距敵寇據點梁家河五里路浮翼公路上之東張村，與敵人和平共居，信使往返，儼同一家。

二月八日，該軍不顧我方忍讓撤退，認爲有機可乘，以第六十九師、四十八師兩師之衆，位置於縱橫三十里之正面，背敵向我四孔山以東之趙城、合鹿一綫猛攻，企圖一鼓殲滅我軍主力。此時我軍被迫只得自衛，激戰兩日，始將其擊退，但未追擊。此役結束後，乘放回俘虜之便，我決死隊政治委員薄一波同志，曾親函楊總參贊，勸其顧全大局，避免內戰，一切嫌隙，均可和平磋商，萬勿使日寇乘機得利。但楊氏及該軍不僅置之不理，反於二月十八日又令六十九師二零五團、二零七團兩部，再度向我合鹿陣地進攻，於是我軍又被迫抗擊，雙方傷亡百餘人。此外，四十八師之第二團團部，於同日進入天墳里敵據點，指揮所部，向我十里原、古羅霸一帶駐地進攻，其第二團則向我油房、塔塔地區進攻，均被我擊退。

閻氏令六十一軍東渡後，爲時不足半月，向我作大規模之進攻即達四次，我方始終堅持團結抗戰方針，薄委員、孫旅長曾再度出勸楊總參贊及梁軍長，又經過我放回之被

俘軍官，向楊、梁面勸。

但六十一軍高級將領，始終執迷不悟，一面下令浮南部隊，加緊向我修築綢堡工事，並大肆搶糧，以備固守；另一方面梁培璜及四十八師師長，於三月二十日，親赴臨汾與日寇開會，要求日寇直接配合向我浮山、安澤地區進犯，並簽訂『各部隊對日本軍之協定書』。茲將在戰鬥中繳獲之該『協定書』（該協定書由複寫紙寫成）原文，發表如下：

（一）爲免除互相之磨擦，協定各部隊之勢力範圍，各與一定之地盤。（二）各部隊在該地盤內之要處，構築障地，設哨警戒，以防共匪之侵入。（三）構築障地之地點及其數目，據各部隊之報告，由日本軍決定之。（四）構築障地所需之日期，遵照日本軍之指示，排除萬難，須在該期日內完成之。（五）關於各部隊服裝之統一，連絡旗改變，另行協議之。（六）各部隊協同日本軍從事討伐期間之經費，概不發給，但以討伐之成果，而加以相當之報酬。（七）報酬方法，以現金或武器、彈藥，其時間以雙方之協定，由日本軍決定。（八）討伐之時，或者因有其他特

殊理由，須要補給武器彈藥之時，亦可補給之。（九）將來於日本軍討伐或因有其他理由，須要各部隊之兵員之時，即刻供出所需之兵員。（十）不論在何時何地，誓必遵照日本軍之指示，對於命令絕對服從之。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自此大會議以後，六十一軍即開始公開和日寇配合，統一指揮，繼續向我進攻。三月二十五日，六十一軍又以四十八師全部、七十二師兩個團，並公開配合浮山坡敵人二百餘人，向我浮山以北及臨洪地區大舉進攻，先後佔領我史壁、杜村、左村等地，而敵軍則在該軍之右側翼，反覆向我李家堡、唐葛、米家垣防地進攻達七日之久，以掩護四十八師趕築碉堡。

四月二十六日，六十一軍又以七十二師全部及六十九師兩個團，附山砲一門，由梁培瓚親自指揮，分三路向我米家垣防地包圍進攻，而浮山敵人百餘名，亦於同日沿浮（山）四（四十里嶺）公路進至灣子里，與該軍會合。

五月三日，敵人將王村據點讓與六十一軍，當時該軍四十八師參謀長親率一個營接防，佔領碉堡後，敵人始撤退。敵臨走時，六十一軍整隊歡送。

五月二十五日，六十一軍聯合敵人，分四路向我進攻，一路由浮山城敵僞五百餘人，向我浮北之平里、龍王屹塔山陣地進攻；一路由舊縣（安澤南）敵僞百餘人，向我後方郭店進攻。四十八師全部及七十二師一個團，則分三路向我高村、王村堡、霍寨堡進攻。

五月三十日，日寇又從臨汾、洪洞、趙城、靈石、霍縣等處，抽調四百餘人，由洪洞出發，增至韓略（敵據點），與四十八師第一團配合，向我楊家村、上寨地區進攻。六月一、二兩日『掃蕩』我甘草、老嶺，三日奔襲老嶺，四日，四十八師第三團則配合日寇，向太平村及李家莊以西我軍進犯，四十八師之第二團，則向我直村進犯。另外，七十二師之二一四團，於同日亦配合浮山日寇百餘名，進至柏村。各路進犯之敵頑，均被我分路擊退，斃傷敵寇百餘人。

六月四日，浮山日寇三百餘，為報復我軍計，配合七十二師之二一四團，襲擊王村堡、崔村我軍。

六十一軍不僅和敵寇公開配合進攻，而且經常與敵寇保持密切的情報聯絡。四月二

十五日，我軍捉獲四十八師第一團的一個通訊員，該通訊員是奉命給韓略日寇送信的，他的身上藏有兩封信，其中一封寫道：

『韓略部隊指揮官偉鑒：逕啓者，茲因本部在太平村駐紮，而楊家掌、孔峪、里開、掛地等村，不時有共黨叛軍活動竄擾，以致民不聊生，茲爲澈底剷除叛軍，以便貴軍雙方完成保甲任務，敝部暫駐楊家掌一部，請貴軍不時聯系，適時予以協助，俾早消滅該叛軍爲荷！』

此致

韓略部隊指揮官台照！

太平村部隊指揮官敬啓四月二十日』（此信蓋有陸軍四十八師第一團本部圖章） 另一封是給韓略日寇的通報，寫道：

『通報（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八時十分於太平村司令部）』

（一）（略）（二）敝部因叛軍時常向我里開、峪頭地區竄擾，於十九日以一
部進駐楊家掌；（三）敝部不時派部，向下安子、柏樹嶺、武家莊、南北掛地一帶

清剿游擊隊，希勿誤會；（四）貴軍所得情況如何？希常聯系，並將目下所得情況告知爲荷！右通報韓略駐軍司令官。太平駐軍司令官啓』

我軍又於五月二十二日，捉獲古縣敵人給左村四十八師師部的日文通報一份，茲譯成中文如下：

『情報通報。昭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古縣警備隊長給左村警備隊長（指閻部六十一軍駐左村部隊。）：（一）二十五團在草峪嶺小樂村，其一部在店子與東直附近；（二）五十七團主力，在李莊附近，一部在五十敏垣附近；（三）五十四團在白廟、壯石一帶；（四）安澤游擊隊，在花車村與三合村附近；（五）洪洞游擊隊，主力在東砦里，一部在南北掛地附近活動；（六）聯絡項目如後：一、三八團如果要北上，貴部偵察出時要通報；二、五十四團活動狀況不明，請偵察並通報；三、五月六日，東直附近戰鬥狀況如何？請通報爲盼！』

自三月二十日以後，三個月中，六十一軍以一團以上的兵力，配合敵寇，向我大舉進攻者達八次之多（一團以下的進攻尙未計算在內）。但當時正當中原戰事發生，我軍

爲配合正面作戰，再三忍讓，繼續釋放俘虜，仍以友軍之誼，懇勸其擺脫日寇羈絆，但完全無效。又據最近投向我軍之六十一軍某軍官稱：六月十七日，第二戰區第十九軍（晉綏軍）六十八師四個團（二零一、二零二、二零三、二零四團），亦奉命東渡，進抵浮南，聲稱增援六十一軍，繼續向八路軍、決死隊進攻。際此正當湘豫戰事緊張之時，閻錫山氏身爲戰區長官，不但不制止六十一軍通敵反共罪行，反增派援軍，擴大內戰。故自六月中旬以後，該軍竟戎焰更張，與敵寇配合，共同向我根據地大肆搶糧，並佈置六十九師全部在浮（山）南，七十二師、八十四師全部在浮（山）北及臨（汾）洪（洞）安（澤）地區各個村，搶收新麥。所到之處，掘地三尺，翻箱倒櫃，衣服布疋均洗劫一空；富戶遠逃，貧戶束手餓斃，造成抗戰以來汾東人民的空前浩劫。

五個月來，雖經我再三忍讓，但六十一軍居然成爲日寇的別動隊（六十一軍辦事處駐臨汾李家衛衛，敵中代旅團司令對門亦設有六十一軍招待處。）和日寇信使往返，配合作戰，簡直變成日寇『掃蕩』太岳抗日根據地的前哨。最近仍在陰謀策劃，協同敵寇，繼

續向我進迫。我全體軍民，莫不痛心焦急，而汾南人民，則扶老携幼，紛紛向薄一波委員及我抗日政府請願，要求保衛家鄉，保衛身家性命。深望閻錫山氏命令六十一軍懸崖勒馬，幡然悔悟，停止禍國殃民行爲，實爲國家民族之幸。同時，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對於此種行爲作何處理，亦深堪注意。

閩錫山所部官佐一八〇名

通電全國反對內戰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新華社太行十一月十二日電)二戰區閩錫山所屬二十三軍、四十三軍、六十一軍、八十三軍、三十四軍及愛鄉團、解救團等部校級官佐一百八十名，於本月九日在太行解放區某地自動舉行大會，聯名發出通電，揭露閩錫山勾結敵偽進攻八路軍，並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原文如下：

國民政府蔣主席、全國各報館並轉全國同胞公鑒：

抗戰八年，日寇投降，全國人民歡欣若狂，我晉綏軍中下級官佐及廣大士兵方期正義伸張，國仇漸雪，正待收繳敵偽武器，嚴懲國賊漢奸，不意進至同蒲正太沿線，日軍仍然手執武器，到處姦淫屠殺，蠻橫傲慢，一如往昔，職等方欲伸張撻伐，忽接上級嚴令與姦賊互助互信，並以投敵之漢奸趙瑞、楊誠不唯未加懲處，反而加官晉爵，部

隊所發之餉金爲狗屁不如之僞鈔。正驚懼間，忽接兼程東進向八路軍大舉進攻之命令，汾東部隊受命行之於前，晉中部隊繼之於後，聲言『一舉消滅八路軍』、『長期確保上黨』。我等念及八年抗戰之人民受盡敵寇蹂躪，國家與民族元氣大傷，迄今寇氛未平，又讓發動內戰，靜夜捫心，潸然淚下，但以軍令森嚴，忍痛兼程前進，及至襄垣長治一帶，被迫向八路軍進犯。誰無父母妻兒，誰無手足弟兄，骨肉相殘，痛心疾首，全體官兵反戰成風，紛紛放下武器。我們到達解放區後，目睹解放區人民生活於民主與幸福之中，與二戰區富人土地被分、窮人嗷嗷待哺之慘狀成一鮮明對比，過去所受惡意欺騙頓時渙然冰釋。追念二戰區幾年以來對日寇不讓放槍，上級反多方勾結，經由敵人掩護通過襄陸大橋，此次又保護敵人從長治撤退等離奇事實，可謂擢髮難數。但上峯對抗戰有功之八路軍，經常聯合敵僞進攻，必欲盡殲而後已，此不獨爲國家民族之無窮禍害，且貽我晉綏軍全體官兵難洗之羞辱。聞閻長官在重慶顛倒是非，推諉發動內戰責任，職等理應仗義直言，申明發動進攻者不是別人，正是閻司令長官，其悖謬措施，命令俱在，可資鐵證。和平乃全國人民之要求，國內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原則下解決，乃國民黨、

當局近更調動大軍，在平綏津浦平漢道清各線聯合敵偽，使用美式武器向解放區進攻，並大肆發行『剿匪手冊』，此種破壞全國人民和平願望的行動，我等堅決表示反對。職等更爲全國愛好和平主持正義之士呼籲，並要求蔣主席、閻司令長官：（一）立即停止對解放區之進攻，拒絕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實在和平建國之願望；（二）迅速重新劃分受降區域，收繳敵人武器，並嚴懲漢奸，解散偽軍；（三）廢除一黨專政，建立代表民意的民主政府，團結一切力量，爲建設新中國而奮鬥。謹電奉聞，敬希鑒察。

閩部將校二百餘人

通電全國呼籲和平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新華社太岳十一月十七日電】在上黨戰役中放下武器之二戰區閩錫山所屬司令長官部中將部副李修禮、三十七師中將師建委溫倬生、砲兵副司令少將李春元、新十一師副師長楊晏卿、六十八師參謀長安克功、六十八師二〇二團楊殿卿、二〇三團團長楊世隆、營長夏誠鼎、李昔春，機砲連長李秀峰、特務連長王國治、大隊長杜宜敏、中隊長王榮恩、連建委張仲雨等將校尉級軍官二百一十七名，頃在太岳解放區聯名發表通電，呼籲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國民黨政府履行雙十協定，立即撤退進攻解放區軍隊，實行民主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原電如下：

國民政府、各戰區司令部、全國人民、國民黨各部隊幹部戰士公鑒：

我們都是晉綏軍的將校級軍官，此次奉命奪取八路軍以血肉換來的上黨地區，被人民的軍隊，八路軍解放出來。八路軍確實寬大為懷，我們在此享受優厚的待遇，在這裡我們親眼見到和平、民主、團結的氣象，人民負擔很輕，人人衣暖食飽，看不到一個乞丐。軍民關係至為融洽，平時人民維持治安，盤查行人，戰時民兵自動配合八路軍作戰，日寇雖用三光政策不時掃蕩，終被八路軍擊潰。現在敵後十九塊解放區都是國民黨中央軍晉綏軍丟掉後，由八路軍從敵人手中奪來的，解放區軍民對自己血肉換來的國土民自主自由的生活非常愛護，人民無一不熱心的擁護八路軍，真誠的信賴共產黨。本來經過八年多的抗戰，全國人民均在水深火熱之中，沒有一個不是祈禱和平渴望建設，在日本投降後蔣委員長請毛主席到渝談判，訂立了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雙十協定，共產黨的新四軍就是遵照了這個協定由華中向華北撤兵，共產黨情甘退讓，是共產黨爲了全中國人民祈禱和平渴望建設並貫徹自己在雙十協定中的和平主張。誰知蔣委員長不執行自己的諾言，撕毀了雙十協定，在新四軍北撤時沿途截擊，企圖殲滅，最近又以八十萬大軍沿平漢路、同蒲路、津浦路向解放區進攻，連日來已搶去了八路軍從敵人手中用血肉解放

的縣城三十餘個，並且國民黨的軍隊到處姦淫燒殺，人民損失極為慘重。國民黨發動這樣反共反人民的戰爭，中國人殺中國人的戰爭，破壞和平，違反民主，實行獨裁，瓦解團結，走向分裂的戰爭，不只是全中國人民不同意，就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也沒有一個同意的。世界的浪潮已走向和平民主，誰要破壞和平民主就該誰毀滅。我們一致的要求國民政府決點撤回進攻解放區的部隊，各戰區司令部不要再聽從中央的不合人民要求的命令，去作無意識的內戰，全中國人民一致的反對內戰，國民黨各部隊的幹部應立即放下武器，停止進攻。最後要求蔣委員長快點執行雙十協定的諾言，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成立聯合政府，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為禱！

(四)

請看閻錫山部下的日記

記着閻逆多少罪惡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新華社太行十一月十五日電) 上黨戰役中我軍在戰場上拾得閻錫山所屬八十三軍六十六師分會三級主任特派員李生康所遺失的日記一本，其中對閻錫山勾結敵僞進攻解放區殘害人民等罪行都很自然的流露出來，茲特一字不改的摘錄數節發表於後：

七月二十二日，隰縣。午飯後由西坡底返城時，狂風大作，急越城門後避之，旋又有稀疏之雨點急劇的打來，此時一輛敵汽車在狂風中捲着塵土由北面閃電似的駛來，晚間傳出一個新消息，梁(延武)王(乾元)二人陪着三位『客人』歸來了。此三人中，除蘇體仁外，其他兩人是日人，一是北平政務委員會顧問，一是太原的參謀長，狂風中急駛的汽車就是載着他們。

七月二十八日，隰縣。來此的三位「外賓」於早九時仍然返回太原，「談判結果未詳」。

七月三十日，隰縣。據內勤隊李毓倫給我的消息，返回太原去的「客人」不久將仍歸來，會長之去孝義將在十日以內。

八月二日，隰縣。閻先生昨晚去了孝義，隨去者有梁化之、吳紹之、郭參謀長等諸人。另息，我軍已臨汾陽城下，另一部已突出了平遙、介休，我想這可能是騎兵軍給閻先生的行色的禮物。

八月二十日，杜家寨。昨天接得長官部的一份通知，山西的保安隊剿共軍（山西僞軍——記者註）已改編爲省防軍、並由楊誠、趙瑞負責指揮。會長（指閻錫山）曾經說過，有一種人應一方面殺他的腦袋，另一方面給他修廟祭祀，我覺得楊、趙在目前尚當適用會長的這種辦法。

八月二十八日，小店鎮。午前本市各界慰勞團由省長（僞省長——記者）王驥率領來慰勞，大會上許振驥軍長開口閉口省長的話，真是抱着王八呼父親有些禮賢的過分了。

九月八日，午飯後，爲了去掉『叛軍』（指八路軍）們潛伏的依據，村鎮近二百公里以內的高粱都被我們打掉了。

九月十三日，桑村。軍部命令中指示西山內的泉川村一帶是八路軍的據點，而且存有大量的物資，故着本師及四十一師之一團取圍攻勢，並令四十九師二團負責山口堵擊逃過的任務，然後由本師派兵搜索，結果在山上逗留了一天，一無所獲。

九月十六日，宿文水東南之梁家堡。部隊今天開始了新的任務的行動——向祁縣集結，未來任務的方向有二：一爲挺進上黨區摧毀『叛逆』的根據地（指解放區），一爲鞏固交通線，以加強軍事力量，而便於南北呼應。午後一時許，在梁家堡宿營。據各方反應，今天是軍紀最壞的一天，向人民動員鞋子連人民足上穿的鞋子也給脫掉了，還有以搜查『叛逆』潛伏及搜找『叛逆』物資在人民家中翻箱倒櫃的，混水摸魚，這樣表現，怎能够收復人心，標榜自己是仁義之師，怎能够使人相信呢？

九月二十四日，宿沁縣屬之西塘村。行進中經過的碉樓車站及日軍築有工事的山頭，日本的旗子仍然招展在空際，那旗子在秋風的擺動裡發出清脆的聲音。

閻錫山批判

著者 印行 總經理 分售 定價

陳伯達等

新華書分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二號

新華書分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二號

晉察冀分
邊區各地新華書店支店
總分銷處及各大書局

每册五十元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出版

7.4
7777.42



定價五十元